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李学勤 著

经典通识讲稿

甘阳 主编

《史记·五帝本纪》
讲稿

李学勤 著

Copyright ©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 李学勤著.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经典通识讲稿)

ISBN 978-7-108-04111-1

I. ①史…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纪
传体②《史记》—研究 IV. 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9889 号

责任编辑 张静芳

装帧设计 张红 朱丽娜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25

字 数 92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已审阅

子居 13-06-20, 16:2

慢下来，静下来

“经典通识讲稿”总序

甘 阳

中国文化论坛在 2005 年于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首届论坛曾以“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为主题，对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状以及开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作了广泛的讨论。那次会上许多学者专家初步达成的共识认为，我国大学的本科教育应该大力推动通识教育的发展，而通识教育的开展则应该首先着重建设“核心课程”，特别是“中外经典文本研读”核心课程。在此共识基础上，中国文化论坛委托我从 2007 年暑期开始先后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汕头大学等合作开办了每年一次的“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讲习班的具体

方式为每次请若干资深教师细读讲解若干经典文本，每天上午授课3课时，下午授课3课时，学员除必须参加上午和下午的课程外，还要求参加至少两次小班讨论（晚上）。目前这个纯粹公益性的讲习班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年，每次接受来自全国各高校的正式学员二百人，加上旁听的人数常达四百人以上，对于传播推广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套丛书以讲习班部分教师的讲稿为基础，同时接受其他优秀的通识讲稿，目的即在让更多读书人分享通识教育的成果。我愿借此机会感谢这些热心通识教育事业的教师，感谢为历届讲习班提供教学场地和行政后勤支持的大学领导和同事，更要感谢参加历届讲习班的数以千计的学员。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有赖于大学领导、大学教师和本科生、研究生的理解与支持，幸运的是，现在这样的支持者正越来越多。

需要说明，中外经典文本细读当然不是通识教育的全部，而只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我们之所以特别注重这个方面，说到底还是希望重新树立认真读书的风气。经典阅读的第一个要求是：Slow down！（“慢下来”！）而不是快餐式阅读。我相信，当今教育的最大敌人就是弥漫整个社会以至大学校园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心态，而通识教育就其植根于古典

自由教育理念而言，首先必须提倡慢下来，静下来，克服现代人的浮躁气和功利心。许多历史悠久的欧美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之所以今天仍然要求必修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并不是旨在把所有学生培养成古典学家，而是希望通过学习这些并无实用性的古典语言让学生慢下来，静下来，从而成为能自由思考的自由人。

我想对所有的大学生说：大学四年，慌什么？毛什么？急什么？慢下来，静下来，开开心心读点书！

2012年六一儿童节

目 录

讲 稿

3 第一讲

30 第二讲

文 本

67 史记·五帝本纪

附 录

139 走出疑古时代

166 谈“信古、疑古、释古”

179 后记

讲 稿

本讲稿根据李学勤先生在2007年7月中国文化论坛“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上的讲课录音整理而成。

第一讲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读的文本是《史记·五帝本纪》。一开始听到主办方给我出的这个题目，我真是大吃一惊，因为据我所知，近代以来，没有人在课堂上专门讲过《史记·五帝本纪》。

《史记·五帝本纪》是我们传统的正史——“二十四史”的第一部的第一篇，内容涉及我们国家、民族的形成，尤其是文明起源问题。中华文明的起源，正是当前我们国家走向崛起的时代中，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已列入国家科技重点攻关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机会在一起研读《史记·五帝本纪》，我觉得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五帝本纪》的写作年代距今较远，文中所谈内容又是那么古，因此阅读难度比较大。但所谓难，并不在于文字难读，而在于如何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正是我为大家讲解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首先介绍一下《史记·五帝本纪》。我刚才说了，它是我们国家正史第一种的第一篇，那么，什么叫“正史”？这是一种传统说法。不是说正史就一定好，别史、杂史、小史就一定差；不过在传统上，“经史子集”的“史”，首先就是正史类，而正史主要就是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第一种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其开篇就是《五帝本纪》。由此可见《五帝本纪》在整个正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作者司马迁是西汉武帝时的人。关于司马迁的确切生卒年，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因为在古书中就有不同的记载。现在我们一般通用的认识是：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死于公元前86年。当然这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前后可能有十年左右的出入，但所谓“知人论世”，我们基本了解司马迁所处的年代就够了。司马迁主要活动于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所以《史记》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初的一部著作，这是可以确定的。

《史记》并非所有部分都是由司马迁本人撰写的。司马迁一生遭遇波折，因李陵案牵连，被冤受刑，后来虽恢复了名誉，但从此碌碌不得志，心境沉郁，所以他在《史记》中没有对汉朝统治者大加歌颂，反而是把统治者不愿

为人所知的一些事情写了出来，特别是有关汉高祖。因此，《史记》在汉朝统治者看来是一种“谤书”，在当时并不十分流行。大家如果细读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汉书》中保存的古字、古义反而比《史记》中要多。我们知道，汉朝时还留存着一些古字。班固作《汉书》，完全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因此《汉书》一出，马上传行天下；而《史记》则受到很大压制，反而流传不广。《史记》一百三十卷，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一些损失，所以有一部分是后人（主要是褚少孙）补写的。褚少孙很有学问，但毕竟比不上司马迁，后补的部分自然就逊色一些。不过，我们今天讲的《五帝本纪》是司马迁本人所写，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这次课程的指定阅读文本是《史记》三家注。所谓“三家注”，第一是六朝刘宋时的裴骃所著《史记集解》，第二是唐朝司马贞所著《史记索隐》，第三是唐朝张守节所著《史记正义》。《史记》如果没有“三家注”，很多地方我们读不懂，因为它是一部相当古老的书，很多解释不能靠简单推测，而是要根据“三家注”来加以认识。

《史记》的“本纪”部分有一个特殊结构，是司马迁

基于对古代历史的整体认识来划分的。我们知道“二十四史”都是断代史，但《史记》本来并不是断代史。司马迁从远古写起，一直写到他身处的汉武帝时期，所以对司马迁来说，他写的是整个历史。在这方面，《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有类似之处。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东西辉映的两部巨著。

司马迁是怎么划分本纪的呢？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再后面我们先不谈。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先秦历史分为四段，五帝是一段，然后是夏、殷（即商）、周。夏、殷、周这三段的写法类似，五帝则是另外一种写法。因此在司马迁看来，五帝是一个大的时期，然后夏、殷、周又是一个时期，秦以后又是另一个时期。这样的划分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符合历史的发展。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五帝”依次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之后是一个个的朝代。那么，“五帝”之前有没有历史呢？司马迁认为，“五帝”之前是有历史的，中国历史并不是从黄帝开始的；但他认为黄帝时期是一个界限，“五帝”以前是一个渺茫的、无法叙述的时期，从“五帝”开始就可以叙述了。在

今天看来，有重要证据可以支持这一观点。

我们今天对古代社会有几种不同的划分方法，大家比较习惯的是按照社会发展来划分，比如说，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来分。过去还有一种很流行的分法，是把整个历史分为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当年苏联的学者反对用“史前史”这个词，说“史前”怎么还有历史呢？实际上这个词在英文中就是“prehistory”。“prehistory”和“history”两者怎么区别？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有文字记载的是“history”；没有文字记载，主要用考古学、人类学或语言学等方法探测的是“prehistory”。20世纪中叶以后，国际上认为这样划分不够清晰，因为中间有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既有文献记载，又需要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补充。现在国际上将这段时期称为“protohistory”，我们一般将其译为“原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并重，越往前考古学的比例越大，越往后则文献记载的比例越大。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将中国的先秦历史作以下划分：黄帝之前，基本上都是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几乎没有，可以说是“史前时期”。从五帝时期开始有所记

载，可以说它介于“史前”和“原史”之间；从夏代开始，文献记载比较多了，夏、商、西周应该说是“protohistory”，即“原史时期”。一般认为从春秋以后就是“history”，即“历史时期”。这样来看，司马迁对本纪的划分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刚才对司马迁的生卒年做了一下说明，那么“五帝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具体时间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但基本来说，大约始于五千年前，这是中国传统的说法。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这两个说法是一回事，就是从《五帝本纪》来的。《五帝本纪》开始于炎黄时期，主要是从黄帝即位讲起。黄帝生活在什么时期呢？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说法，但一般来说，是在距今四千七百多年到五千年之间，我们就保守一点说是四千七百年左右。按古书传说，炎帝有八世，即神农氏有八代。古代一般是三十年算一世，炎帝八世，就是二百四十年，加上四千七百多年正好是五千年。

中国准确的纪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现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我们有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大型科技攻关项目，我

们制定了《夏商周年表》，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有科学依据的一份年表，当然，不是最后的。历史是连续的，可以一年一年往前推，而且不但可以逐年推，甚至可以逐月、逐日往前推。中国的历史，我们一直能推到公元前 841 年，在此之后是不容怀疑的，因为它非常准确。公元前 841 年是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西周晚期的周厉王昏庸残暴，压迫百姓，后来百姓起来反抗他，把他赶走了。赶走之后国家没有王了，也没有再立王，就由一些大臣共同执政，叫作“共和”，今天我们说“共和国”就是借用了这个说法。共和元年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第一年，再往前，司马迁虽然看过很多种年表材料，但他认为其间互相矛盾，所以没有采用，《十二诸侯年表》之前只编成《三代世表》。有人可能会想：你这么说是不是泄中国人的气啊？不是这样，不管希腊、罗马也罢，古代埃及也罢，两河流域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年表精确的也大都推到公元前七八世纪，和我们差不多。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非常悠久，但是中国历史究竟古到什么程度，在人类历史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恐怕很多人没有概念。我们可以作一个具体的比较说

明。在世界古代历史上，年表的研究最多，而且比较准确的是古埃及年表。古埃及和中国一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的年表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它是依据一本古书，其作者是古埃及的一位僧侣（或者叫祭司），古代的僧侣、祭司每每都是学者，这位祭司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名叫曼内托（Manetho）。曼内托是公元前2世纪的人，写了一部《埃及史》，可能比司马迁稍早一些。在他生活的年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还存在。曼内托看到的很多资料，在这座图书馆毁灭之后就不复存在了，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多是后人所看不到的，正如司马迁看到的东西大多是我们看不到的一样。

曼内托的《埃及史》虽然已经散佚，但是它的内容有不少通过其他书籍的引文保存了下来。由此，我们知道他对古埃及的整个历史是如何划分的。曼内托把古代埃及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三十一个王朝。三大时期是指古王国时期（Old Kingdom）、中王国时期（Middle Kingdom）和新王国时期（New Kingdom）。

在中国，“五帝时代”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70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我们把夏大约定在公元前 2070 年到公元前 1600 年，商大约是公元前 1600 年到公元前 1046 年，西周是从公元前 1046 年到公元前 771 年。这样的划分不一定准确，但这是目前我们所能列出的比较好的一个年表。

大家再来看埃及的年表（我给出的数字是根据最新的一个年表，出自牛津大学 1994 年出版的《古代埃及史》，还参考了台湾一位埃及学者 2001 年的修正）：古埃及的前王国时期（第一王朝到第二王朝）是公元前 3150 年到公元前 2700 年；古王国时期（第三王朝到第十王朝）是公元前 2700 年到公元前 2040 年；中王国时期（第十一王朝到第十七王朝）是公元前 2040 年到公元前 1552 年；新王国时期的前段（第十八王朝到第二十王朝）是公元前 1552 年到公元前 1069 年。第二十王朝以后埃及就进入了被削弱、被统治的时期。

在时间范围上，古埃及的前王国时期加古王国时期与中国的五帝时期非常接近，仅仅是古埃及第一王朝的开始比我们早一百五十年，但是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很准确，所以可以说两者差不多。大家要知道，埃及的古王国时期还

是铜石并用时代，不是青铜时代。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如果按照公元前 2040 年来算，与夏朝开始的公元前 2070 年只差三十年；两者结束的公元前 1552 年与公元前 1600 年，只差四十八年，太接近了。所以，我们的夏朝基本上就相当于古埃及的中王国时期，这是青铜器时代的开始。我们的商朝是繁盛的时期。尽管周朝有八百年历史，但春秋以后就分裂了，而商朝从来都是统一的国家，还有古人说商朝有近六百年的历史。按“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年表看，我们的商朝和古埃及最盛的新王国时期的前段，起始年份和结束年份也很接近。

通过这份年表，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五帝时代”真是古老啊，真是中国文明的开端！

接下来，我们开始逐段阅读《五帝本纪》。

第一段讲的是黄帝的诞生和他所经历的战争。首先我们来看黄帝是怎样一个人：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少典”可能是古代一个国或氏族的称号。传说中的少典氏之国，按照《史记》之后的一些记载，多认为是在今天的河南新郑。我本人也去新郑看过，那里还有后人立的一个碑，写着“少典氏之墓”。这个不足为据，但毕竟有这么个传说。

我们读“三家注”可知，黄帝是“有熊氏”，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年代久远，因为古人的名字常常和动植物有关。黄帝是有熊氏，“有熊氏之墟”就在新郑，新郑现在每年都会举行祭祀黄帝的典礼，少典被认为是有熊的国君。西晋皇甫谧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他肯定了新郑一说。所以，黄帝是中原地区的人，这点是明确的。炎黄二帝传说都与少典有关，这个说法见于《国语》。《国语》与《左传》并行，传说也是左丘明所记，这一点还有待考证。

“黄帝者，少典之子”，这是对的，但下面一句“姓公孙，名曰轩辕”有问题。《史记》的一个大错就是把姓和氏弄混了，这不是司马迁的学问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秦代之前，中国自古以来姓和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比如今天你问我：“老

师，你姓什么？”我说：“我姓李。”这没问题，可是在先秦就不对了。因为在先秦时候，每一个男人，如果是自由人的话，应该有一个姓，还有一个氏，比如姓李的按传说都是嬴姓。传说尧的时候，伯益（他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第一个大法官）被赐姓嬴，大法官当时称“理”，“理”通“李”，李姓就是从这儿来的，这是“以官为氏”。

男人对外说话或写字的时候，不能称自己的姓，要称自己的氏。现在很多人误以为先秦的姓和名可以连称——事实上对男人来说姓名不能连称，只有女人可以——所以就闹出了很多笑话，比如一些书上说“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很难听。那么对国君、贵族应该怎么称呼呢？他们以封地为氏。比如周公封于周，是周氏，应该叫“周旦”，所以他叫“周公旦”。再如晋文公名重耳，重耳封于晋，晋就是他的氏，所以他应该叫晋重耳。古书里说到晋重耳有时省略一个字，叫作“晋重”。

女人则是要称姓的，因为同姓不能结婚，古人特别重视这一点。娶女子必须知道她的姓，如果买妾不知其姓就要占卜，如果卜出是同姓，依然不能结婚。到了战国末年，特别是秦统一以后，同姓不婚的要求就淡化了。因为同姓

的人太多，特别是姬、姜、嬴等大姓太普遍了，不能再实行同姓不婚，所以逐渐就变成了同氏不婚。

大家心里一定有疑问：司马迁是怎么研究黄帝的？他怎么知道这些历史信息？应该讲，司马迁记载的内容都有依据，他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我们看看《五帝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就能知道他当时是怎样研究五帝历史的。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尚”是“古”的意思。在司马迁之前很长时间，学者们就在讲五帝之事了。虽然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尧在五帝之内，但尧以前的黄帝等，《尚书》没有记载。传说《尚书》是孔子选定的古代文献的汇集。孔子选入的第一篇是《尧典》，所以说“《尚书》独载尧以来”。诸子百家谈黄帝，说法不一。“荐绅先生难言之”，引的是后面我们会谈到的《五帝德》中的话。“荐绅先生”是指学孔孟之道的

儒者。当时人认为非常权威的《尚书》中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百家谈黄帝又互相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当时的学者们就很难讨论这个问题。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宰予问五帝德》是书名，宰予是孔子的弟子，也叫“宰我”，这篇书的内容是宰予与孔子的对话。《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今天都还存在，收在《大戴礼记》中。对比《史记》我们就能知道，司马迁采用了这两篇的内容，因为他认为这是孔子说的话，但是这两篇文章“儒者或不传”。那么，司马迁怎样研究五帝历史呢？他用的是旅行调查的方法，这和我们现在做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是一样的，即所谓“田野工作”。司马迁做了非常广泛的调查工作，他“西至空桐”（空桐山在现在的甘肃），“北过涿鹿”（涿鹿就在北京附近，官厅水库的西边，现在还叫涿鹿），“东渐于海”（往东到了海边），“南

浮江淮”（南边到了长江、淮河地区）。他在这些地方做什么呢？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意思是说，那些地方都还代代流传着黄帝、尧、舜的传说。我们常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他不仅仅在图书馆看书，还要亲身调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五帝本纪》不但综合了各种文献的说法，还与民间传说相对照。我想，今天我们研究上古的历史，也应该用这种方法，一方面通过文献，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口头传说。司马迁通过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是“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意思是：各个地方有关五帝的传说有些差别，但综合起来看，它和古代的文献记载（这里主要是指《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基本上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通过比较，认为《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里的《春秋》就是《左传》，《史记》中很多地方讲到《春秋》，指的就是《左传》，因为在司马迁看来，《左传》和《春秋》是分不开的，是一回事。司马迁说：《左传》、《国语》能启发、证明《五帝德》和《帝系姓》。虽然它们的内容不是那么系统、深入，但都是有依据的。古书里的很多东西现在都没有了，但流散出来的材料还是存在的，这是他的结论。司马迁还是很自豪的，他说，若不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是“浅见寡闻”的人，是不能够懂这个道理的。他把他搜集到的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都记录下来，便有了这篇《五帝本纪》。

王国维先生曾说，古史研究是最难的，因为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古代历史，总是与神话传说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但是在这些材料里面，依然有

“史实的素地”。这是王国维先生 1925 年在清华大学教授《古史新证》时讲到的，司马迁作《史记》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下面我们再回到《五帝本纪》前面的本文部分：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根据《五帝本纪》，神农氏就是炎帝。神农氏和炎帝是不是一个人，从来就有不同的说法，司马迁采用的是两者同一的说法。他认为神农氏是当时天下的君主，而且经过若干世代已经衰败，所以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并不是第一个炎帝。后来有很多书里都提到，神农氏或炎帝有八代，最后一代按后世记载叫“帝榆罔”。帝榆罔就是黄帝所继位的炎帝，不过这是后来的一种说法，司马迁时期是否有这种说法我们还不能证明。“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这里的“诸侯”可以理解为当时的很多部族，他们互相之间争夺打仗，不服从炎帝的命令，而且暴虐百姓，但神农氏已经衰

弱了，无法平定诸侯，造成天下混乱、分裂的局面。

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享”本来是贡献、祭祀的意思，特指祭祀用的贡献，这里的“享”指的是对天子的贡献。轩辕“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诸侯中最不服的就是蚩尤。蚩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传说他创造了五种兵器，“蚩尤作五兵”的说法一直到汉晋时都非常流行。蚩尤武艺高强，“最为暴，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很多诸侯已经偏向轩辕，而炎帝又要去侵犯这些诸侯，从而他们“咸归轩辕”，于是，“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虎，

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就是著名的阪泉之战。阪泉之战是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的一次战役，虽然是传说，但古书里有明确记载，阪泉也在涿鹿一带，所以涿鹿这个地方确实和黄帝的传说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蓺五种”一句。“五气”指“五行”，中国古代传说经常提到“五行”，此时是否已有这样一种哲学观念，我们不清楚，但这种说法在古代传说中反复出现，“汨陈五行”还是很大的罪恶。“五行”之说，后人的解释认为，要顺应金木水火土各种物质的本性，而不能违背其本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史的问题，今天不能详谈了。“五种”是指五种粮食。“熊罴貔貅豸虎”，现在有人认为这是一些氏族的图腾；按照传统说法，是打仗布阵的名称。究竟哪个说法对，大家还可以讨论。“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正式取代了炎帝的地位。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

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黄帝把各方面军队组织起来，还是在涿鹿一带，抓住蚩尤，把他杀了。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我再补充一点：炎帝的“炎”字在古文字中和“赤”字相近，“赤帝”一词，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是在《逸周书》中。《逸周书》是汉朝时就已经有的一部书，传说是孔子编《尚书》未入选的余篇。其中有一篇叫《尝麦》，也谈到了黄帝打仗的故事，这个故事很复杂，与《史记》的记载不太一样，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尝麦》这一篇，近几年经过学者的研究，可以肯定是作于西周，里面提到“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赤”即“炎”，赤帝也就是炎帝。

以上是《五帝本纪》的第一大段，说的是黄帝通过战争，取代了炎帝神农氏的统治。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和中国当时国家的形成有一定关系。

接着看下面一段：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这一段讲的是黄帝时期的地理状况，其中涉及的各个地方的位置，“三家注”里都有解释。大家会发现，黄帝的统治区域和司马迁“田野工作”的地理范围差不多，可见司马迁是根据这样一些传说来进行调查的。“荤粥”是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釜山”就在涿鹿一带，最后黄帝就将他的首都建于“涿鹿之阿”。

下面一段讲的是它的制度和文化的：

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禪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

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时期不像后来的朝代那样有一个固定的都城，虽然他“邑于涿鹿之阿”，但并不是停留在那里，而是四处迁移，以军营作保卫，这一点很重要，我想这也符合最早时期的国家形态。早期的人类，尤其是草原游牧民族，都是以帐篷环绕一圈，中央有一个大帐，那就是政治中心。蒙古很长时期都是如此，它的汗国都是以某某帐命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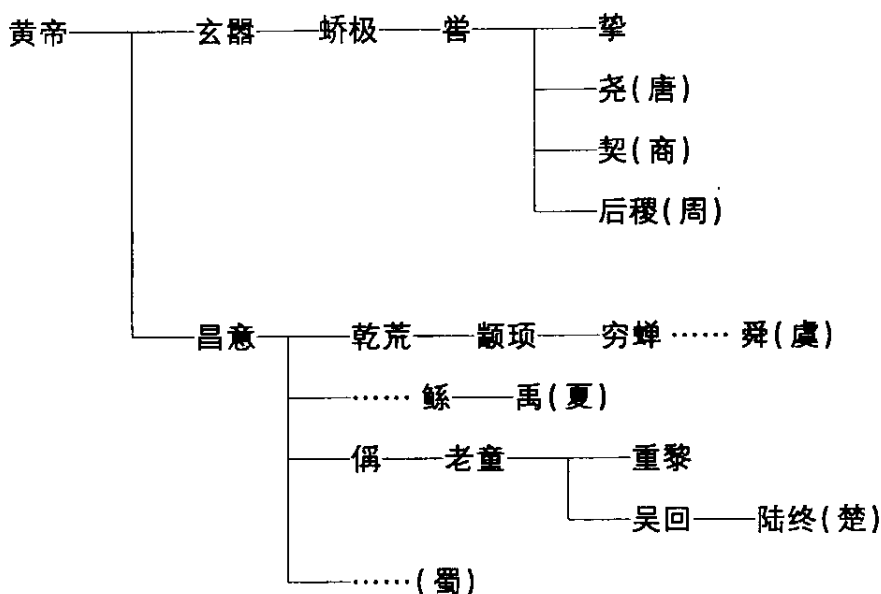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这一句出自《左传》。《左传》中说不同时代的官名是不一样的，比如“少皞氏以鸟名官”，黄帝时代则以云名官。这些在《左传》昭公十七年注释中有详细说明。后面几句，除了“有土德之瑞”是后人五行学说的一种说法以外，其他都与人类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进展有关系，涉及农业、采集业、家畜、矿物等各个方面。

下面一段尤其重要：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嫫祖。嫫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这个说法见于《国语》。黄帝据说有二十五子，其中十四个得姓，成为十二个姓。大家注意，古书里说谁是谁的子，并不一定就是指亲生的孩子，往往是后裔的意思。对于上古传说中的世系，我们要灵活对待，否则很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了。

嫫祖也是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被称为中国的蚕桑之祖。关于嫫祖的出生地有多种说法，有人说在山西，有人说在四川盐亭。嫫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玄嚣，一个叫昌意，一个“居于江水”，一个“降居若水”，这就是黄帝之后的两大系。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张表：



这张表不代表上古世系的事实，但它反映了中国最古的一些世系传说，这些传说包含着很多有意思的信息。比如按照《史记》的记载，黄帝、颡顛、帝喾是五帝中的三帝，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黄帝的关系都很密切，再往后的尧，传说是喾的儿子，而舜和颡顛之间就隔了很多代，所以古人其实也已经指出，不能完全相信传说，但传说能显现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五帝的这些传说就反映出当时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关系网。

如果按照《五帝本纪》这种带有神话性的说法，后来

先秦的主要朝代和人物都可以归于这两大系，我们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的基本依据也就在这里。比如后来的古书里说，楚国是从颛顼这一系发展而来的，蜀国是从昌意这一系发展而来的，夏禹也可归于昌意这一系。现在从考古学来看，我们发现三星堆文化确实与夏有关系，楚和蜀也有密切的关系。我个人认为，如果灵活变通，不拘泥于谁生谁的问题，我们还是能从这个表中看出很多道理的。通过这个表，我们还可以校出一些书上的错误。比如昌意的儿子乾荒，有的书上写的是“韩流”，“乾”与“韩”、“荒”与“流”字形很像；还有“老童”，有的书上写的是“卷章”，也是字形很像。我可以告诉大家，“老童”是对的，因为现在出土的楚国的竹简里就叫“老童”。

“黄帝崩，葬桥山”，黄帝死后葬在桥山，这是明确的。司马迁说的“桥山”这个地名，就是现在陕西省的桥陵。《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的内容就写到这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有关黄帝的古文字材料最早是战国的。战国前期的齐威王因齐，在他的一个敦上铸的铭文中就提到了“高祖黄帝”。这一类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传说一直存在着。

接下来，《五帝本纪》就开始讲黄帝之后的二帝。

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蛸极，蛸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蛸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这是当时一个很普遍的传说。据说帝喾生下来的时候，自己说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在“三家注”引《帝王世纪》中有：“自言其名曰岌。”后来有人研究认为“岌”是个错字，应该是

“俊”。《山海经》中有很多地方提到“帝俊”，这个“帝俊”应该就是指帝喾。如果你相信这一点，《山海经》中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帝俊（俊）的神话，比如帝俊生十日、十二月，十个天干、十二个地支都是从这儿来的。

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巍巍。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

这就是帝喾的故事。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把五帝中的前三帝读完了。大家可以看到，关于帝颛顼和帝喾，除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中的内容以外，司马迁并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和关于黄帝的部分不太一样。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有关帝颛顼和帝喾的传说，在当时并不是很丰富。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第二讲

上次课我们讲了两方面：第一是对司马迁和《五帝本纪》的相关介绍；第二是读了《五帝本纪》中有关黄帝、颛顼和帝誉的内容。今天的课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是接着读文本中有关尧、舜的内容；第二是谈一下有关五帝时代研究的争论；第三我们讲一下考古研究和上古历史的探索。

司马迁编撰《五帝本纪》，主要的依据是现在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和《帝系姓》，同时也参考了一些民间传说。但是，有关帝尧和帝舜的内容，他虽然也参考了《五帝德》和《帝系姓》，但更多的材料，用的是《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大家知道，“十三经”的第一种是《周易》，第二种就是《尚书》，《尚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就是《尧典》和《舜典》。但是在《五帝本纪》中，包括“三家注”，主要提到的是《尧典》，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先秦时代，《尧典》和《舜典》常常是连成一篇的，有时还称《帝典》，到后来才被分成两篇，所以下面

我们再提到的时候就简称《尧典》，这一点先说明清楚。

我们读司马迁的《五帝本纪》，会有一个特别的印象，就是在司马迁看来，《尚书》以《尧典》作为开篇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因为在司马迁的时代，所有人都会知道，《尚书》中有关五帝的内容，并非只有《尧典》一个选择。孔子之所以断自尧、舜，是因为他把尧、舜作为他政治理想的一种寄托。从儒家角度来说，尧舜时期是中国历史的黄金时期，代表了儒家的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理想，因此将《尧典》作为《尚书》第一篇不是随随便便定的，是有其特殊用意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史记》三家注中也有所涉及。

如果把《尧典》和《史记》逐字逐句对照来看，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地方。首先一点是，司马迁并没有逐字引用《尧典》。比如我们现在要引用《尧典》，一定是一句句抄下来，但司马迁没有这样做。文句的基本结构不变，但很多字变了，这是《史记》一个很大的特点。司马迁认为《尚书》很难读，所以在很多地方，他选用了当时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些字来代替《尚书》原文中的字，可以说是把很多东西“现代化”了。通过他这样的“现代化”，我们读《史记》比读《尚书》容易多了。与此同时，我们

也得以了解司马迁本人对于《尚书》的理解。司马迁根据自己的理解，用一些字或词代换了《尚书》中古奥难解的词，这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今注今译”。大家知道《尚书》有今文、古文之争，不仅仅是版本文字的不同，更重要的是意义理解上的不同。司马迁本人既对今文《尚书》的传统解释十分熟悉，同时他又是最早研究古文《尚书》的孔安国的学生，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史记》中司马迁的描述，很大程度上了解到孔安国对于古文《尚书》的一些理解。

《五帝本纪》中有关尧、舜的描述，绝大多数依据的是《尧典》的内容；没有采用《尧典》内容的，最主要的就是舜年少时期的故事。我们先来看舜的出身：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接着又讲他的父亲、继母、弟弟如何想要谋害他。这些内容，司马迁基本依据的是《孟子·万章上》。除此以

外，关于尧、舜的内容，司马迁别有所本的，只有在位年数等，其余大多数内容都是根据《尧典》而来。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尧典》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书？它的历史价值如何？对此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论，到今天都没有定论。因为《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关系到中国古史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内容，对研究古史有很重要的价值。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地来谈这个问题，只举几个例子。

《五帝本纪》中提到的“敬授民时”这个概念，就是从《尧典》而来。《尧典》一开头，讲的就是有关天文历象的内容。后来的学者反复谈论这个问题，认为非常重要。清初“三大家”之一顾炎武就说，现在的人和古人不一样，古代人人都懂天文。《尧典》是当时人人必读之书，而不懂天文就不可能理解《尧典》，所以当时的人普遍都掌握了很多天文知识。顾炎武的这番话有一定道理，因为在上古时代，天象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确实比后来要大得多。中国自古以来逐渐进入农业社会，农业与四时运转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一直到今天，如果你到农村去，会发现很多农民或许在其他方面没有太多文化知识，但如果你跟他谈

节气，他一定说得朗朗上口。我在农村下放时，我的房东可以熟背二十四节气，但他根本没有念过书。为什么？因为这和他的生活、生产关系最密切。所以天文学在中国，和在近东，如巴比伦一样，是最早兴起的一门科学。

下面我们就来读一读《五帝本纪》中与“敬授民时”相关的内容。首先讲到尧是帝喾的后人：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勳。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喾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

尧的名字叫放勳，后来成为帝尧。摯是先于尧继位的，死后他的弟弟尧继位。尧继位之后，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这是一个总的概括，形容他政治如何清明。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首先做的是：

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敬授民时”是尧的德政中最主要的一条。他派羲、和到四个地方去观测天时。羲、和是四个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他们观测天时的方法是在二分、二至的时候观察“昏中之星”。所谓“二分二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就是地球公转的四个点。“二分”就是春分和秋分，“二至”就是夏至和冬至，这些时间都是固定的，不会改变。比如“二至”就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和白昼最短的一天，前者是夏至，一般是在6月21日或22日；后者是冬至，一般是在12月21日或22日。

“二分二至”是地球运转的四个固定点，在这四个时间点，看日落星光刚刚出现的时候，哪一个星宿正处中天，正在子午线上，这就是所谓的“昏中”。“昏”，就是日落星光初现；“中”，就是这个星宿正在子午线上。古代传说有二十八星宿，当然《尧典》当时不一定有这么系统，但是有些星宿非常有名，每一个星宿中都有标志性的星。比如我们常说“三星照，年来到”，三星就是参宿的一个重要标志。

有关“观测天时”，下文有详细描述：

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

这是在东方的一个观测点，具体在什么地点不去讨论了。“中春”就是指春分。这个时候日中的星是鸟宿，鸟宿是南方朱鸟七宿。“其民析”的“析”我们待会儿再讲。动物开始“字微”，就是求偶交合的意思。

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毳毛。

这就是所谓的“四中星”，这四个固定的星宿到了“昏中”，就确定了“二分二至”，换句话说，就确定了一年的四季。从古至今，有许许多多人在推算《尧典》“四中星”的观测年代。不但中国人在推算，很多外国人也在

推算，所得的结果不太一样，因为有几个问题大家看法不同，比如说观测地点的问题。《尧典》中提到的四个观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后人对此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所有的观测活动都是在尧都的位置。尧都传说是平阳，在山西的中南部。我们知道，由于地球的运转，天上的星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如果拿《尧典》中的星象与今天来比，差别会很大。那么，《尧典》中说的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天象？目前最好的、以尧都中原地区为标准的推算结果是竺可桢先生得出的。竺可桢先生那篇著名的《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他得出的结果是：四中星是在商末周初出现的，换句话说是在公元前十一二世纪。现在多数天文学史学著作引用的都是竺可桢先生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后来经过很多学者反复推算，当然推算的结果也会有一些前后出入，但基本上是认可竺可桢先生的观点的。不过，这个情况后来有所改变。1983年，天文史家赵庄愚先生发表了一篇论文，引起天文学界的重视。这篇论文登载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史文集》第十辑，名为《从星位岁差论证几部古典著作的星象年代及成书年代》。他的文章采取了一个新的

观点，即他认为应像《尧典》记载的那样，把人派到不同的地方去观察，而不是在首都一个地方观察。他定了四个点，用当地的经纬度计算，他认为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2060年。这个时间比较契合于我们所设想的尧舜时代。有关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关于“敬授民时”的内容影响非常大。这种由国家、中央颁发历法，确定农作时间的传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传流了下来。明朝在北京的午门，至少一直到清初，每年都要举行一个典礼，就是在立春这一天，宛平县的县令（北京在明清时分为两个县，一个是大兴县，一个是宛平县）带着一些老农到午门前跪成一排，由太监系下一个镏金凤凰，凤凰嘴里叼着诏书，宛平县令跪接诏书并当众宣读。诏书上的话不是用文言文写的，而是大白话，因为它代表皇帝对老百姓说话。这几句话的大概意思是：今天到了立春了，大家该种地了，你们应该带着你们的子弟好好去种地。这个典礼是一种象征，它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朝廷不管有多高、多深，它始终有一个责任，就是“敬授民时”，这个传统就是从《尧典》来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可以说明《尧典》中包括了一些很古老的内容，这是20世纪40年代由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发现的。胡厚宣先生是1934年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毕业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参加殷墟发掘，跟随董作宾先生从事整理甲骨文的工作。他在40年代所著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几片甲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片：



“四方风” 胛骨拓本

在看这片甲骨之前，我们先来读一下《五帝本纪》中的这几句话：

其民析，鸟兽字微。……其民因，鸟兽希革。……
其民夷易，鸟兽毛毳。……其民燠，鸟兽毳毛。

东方“其民析”，南方“其民因”，西方“其民夷易”，北方“其民燠”，这是什么意思？大家看“三家注”就能知道，这主要和一年四季东南西北的农事有关。“析”的意思是一家子人都分开了，大家都去种地了；“因”的意思是大家集合起来，一起进行农事；“夷”和“易”都是平的意思，庄稼收获了，把地都铲平了；“燠”是藏的意思，大家都藏起来了。有关这几个字的解释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但基本上，这段话讲的就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用这样一个农事的循环来代表四季。

现在我们来看这片甲骨。它是一版牛肩胛骨，属于商朝的武丁时期，原藏家是近代著名收藏家刘体智。奇怪的是这块不是占卜的卜辞，骨版上刻着四段话：“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韦，风曰彝（根据其

他甲骨文来看，这里的西方一句，把风和方的名字写倒了，应为‘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

“析、因、彝、宛”，与《尧典》或《五帝本纪》中的内容完全一样。这块甲骨的出现完全证明了《尧典》中的这段话和《山海经》中零零碎碎的一些记载，说明至少商朝人对此完全了解。《山海经》说，“析、因、彝、宛”是东南西北四方神的名字，这些神是管日月出入长短的，与一年四季有明显的关系，这又与农业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四方有神，四风也有神。东风叫协，南风叫凯，西风叫韦，北风叫役。胡厚宣先生的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研究《五帝本纪》、研究《尧典》非常关键。

以上就是有关《尧典》的一些情况，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详谈了。

那么，在《五帝本纪》中，除了“敬授民时”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内容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关于洪水的问题。

洪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洪水的故事不只中国有，全世界都有，很多国家都有洪水

传说的记载。基督教的《圣经》中就有诺亚方舟的故事：上帝看到人类罪恶太多，决定用洪水对人类进行惩处。可是上帝还是很仁慈的，不想使人类和各种动物灭绝，于是上帝把洪水的消息告诉了诺亚，让他把世界上的每一种动物各选一雌一雄，带着这些动物标本躲在方舟里。然后洪水就下来了，毁灭了人类和其他动物，只剩下诺亚方舟。

80年代我在英国伦敦大学见过一本书，这本书搜集了全世界各种文献和民间传说中的洪水故事，包括中国的。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所有的洪水故事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因为某件事情得罪了神，神就降下洪水，毁灭了一切，然后神又大发慈悲，使其复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模式，包括我们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都有这样的故事。

但是，只有我们中国尧舜禹时期的洪水传说是不一样的。第一，它没有说人类犯了什么罪；第二，它是通过治水的方法免除了洪水，也就是人通过与天斗争，解决了问题。这两点是它和其他传说的不同之处。有关洪水的传说，有一个弗洛伊德学派的解释，他们认为，洪水故事与人

的诞生有关。每个人都是从母亲的肚子里出来的，都经过“洪水”才降生到世界上，所以人类的诞生也有一个经历洪水的过程。但是，这个解释也不适用于中国尧舜禹时期的洪水故事。

那么，这个洪水故事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呢？现在我们能找到的最新材料是2002年发现的一件西周青铜器，我称之为“遂公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左右。“盨”是一种祭祀用的长方形器皿，相当于一个青铜大饭盒，可用来装黍、稷、稻、粱之类的主食。“遂公盨”的铭文中就提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开头一段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当然这些字都很难认，我读出来之后大吃一惊。现在，这件珍贵的文物收藏于北京的保利艺术博物馆。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是什么意思呢？“禹敷土”三字见于《尚书·禹贡》，“随山浚川”四字见于《禹贡·序》，文字完全一样。在其他书里没有相同的文字，但在《尧典》中有非常相似的表述，所以这件“遂公盨”的出现，为我们了解五帝时代的历史传说提供了重要帮助。

《五帝本纪》中有关尧、舜的部分，还有一点比较重要，就是有关“四罪”和“二十二人”的内容。在尧舜时期，曾有人对政权进行反抗，或者叛变、犯罪，这些人就是所谓“四罪”。舜摄政时期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惩治四罪，包括“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舜把共工、驩兜、三苗、鲧四个人放到四方，这些内容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民族关系。

还有所谓“二十有二人”，包括四岳、九官、十二牧。按照《五帝本纪》，舜把整个天下划分为十二个州，十二个州有十二个官。另外他还任命了一些朝廷官员，如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乐，龙作纳言。这些官员的任命在后来的很多书里都有涉及，一直到明清时候，这些词还被借用以表述为臣为官的意思。比如《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人对他说了两句话：只道骅骝开道，原来天府夔龙。这个人就觉得非常吉利。后来他被派到“天府”四川去做官，到那以后，一阵大风吹起官府大堂匾上的纸，露出“天府夔龙”四个字，结果他就死在那个地方了。什么叫“天府夔龙”呢？看了

《五帝本纪》就知道，夔为典乐，龙是纳言，夔龙就是大臣的意思。这虽然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故事，但反映出的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了《五帝本纪》对于我们国家政府机构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帝本纪》中有关尧、舜的内容，我们就谈到这里。我们举了一些例子，不管是天文推算，还是古文字的证明、与其他材料的对比，都是为了说明这些记载都是有所本的。至于这些内容究竟在什么时候定本，还需要学术界进一步讨论。

五帝的内容介绍完了，现在我们可以对《五帝本纪》作一个概括：它从黄帝讲起（实际上是从神农氏、炎帝时期讲起），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一直叙述到尧舜时期，夏朝成立以前。它所依据的不仅是经典文献，还包括一些民间传说。司马迁根据当时他本人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上古历史的起源进行了综合与探讨。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作为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一种勾画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通过黄帝时期各方面的措施，包括黄帝本人和一些臣子的作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明的因素正在逐渐聚集增长，黄帝时期是中国文明开始形成的时期。陕

西桥陵有一个匾，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也就是文明起源的意思。

下面我们再来谈一下关于五帝时代古史问题的讨论。

我们读了《史记·五帝本纪》，对五帝时代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华民族走向文明的一个关键时期，是我们的文明起源、奠基的时期。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大意是说：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就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马克思认为所有的科学知识都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不管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可以放到大的历史学的范畴内。

如果用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整个的自然史和人类史有几个重要的起源问题。第一是宇宙的起源。过去认为宇宙的时间是无限的，没有起点，没有终点；但是今天看来，宇宙也有起源问题。比如根据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里讲的理论，时间起源于一百五十亿至一百七十亿年前，在这之前就无所谓时间了。不管是弦理论，还是膜理论，现在大家普遍认可，宇宙的起源问题是一个

重大的科学问题。宇宙是有起源和终结的，一切东西都有起源和终结。

在宇宙的起源之下，还有第二个起源问题，小一点说是地球的起源，大一点说是太阳系，甚至银河系的起源。如果说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宇宙学、物理学的问题，那么地球或太阳系的起源可以说是天文学和地质学的问题。

在这之下，还有生命的起源问题。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寻找外星生命，可是到今天为止，依我个人看，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地球之外存在生命。然而，我们还是要探索为什么在我们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行星上会有生命，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

再往下是人类的起源。现在这方面有很新的学说，比如有人提出“夏娃理论”，认为现代人都是在七万到十万年前，从东非一个女性而来，这个女性是所有现代人的祖先。

接下来就是文明的起源，我一再强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人类真正脱离自然的动物状态，才有文明的出现。中国的文明起源在整个人类文明起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应当结合各种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和探索文明起源问题。《史记·五帝本纪》是有关中国文明起源

的一种文献传说，这种叙述有其重要价值，所以五帝时代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近代以前，虽然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大家对于传统古史的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比如戏曲唱词中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个系统在今天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三皇”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先有天，后有地，再有人，然后有伏羲氏、神农氏等等。伏羲氏驯化动物，神农氏始作农业，这些都与人类的发展密切关联。不仅仅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现在世界上最早的古史记载，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上面刻有创世的故事。

昨天课后有朋友问我对疑古思潮和古史辨派的看法。我个人不太赞成“古史辨派”这个说法，因为“古史辨”并不成派，而是一场讨论。《古史辨》本身是一部书，从1923年到1936年，一共出了七册，这七册书里的论著观点是不一样的。当然，主持这部书的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所以，所谓的疑古派、古史辨派，其实指的是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一派学者的论点。

从疑古思潮开始，对“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

今”这个传统的古史系统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思潮并不是从顾颉刚先生开始的，而是始自晚清，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属于今文经学派，是疑古思潮的前驱。《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代表性著作。何谓“新学伪经”？康有为认为，汉朝之后的经学已经不是真正的经学，而是以王莽时代的刘歆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制造出来的伪经。王莽称帝，国号为“新”，史称“新朝”，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新学”。“新学伪经考”即是对“新学”、“伪经”的考证。康有为认为很多古书都是伪作，孔学也不是真正的孔学，真正的孔学是要改制的，所以叫“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一破一立，一正一反，互相配合，构成了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新学伪经考》因其新奇大胆，震动了当时整个中国学术界。如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所言，《新学伪经考》从根本上对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进行了彻底否定。

近年有一个说法，认为康有为的这个观点不是他本人所创，而是由四川的今文经学家廖平提出。廖平先生是清末民初最大的今文经学家，由于四川当时交通不便利，他的很多著作无法传播开来，可是他的学术地位很受尊崇。廖平先生

最著名的是所谓“经学六变”，他的经学主张一辈子改变了六次。廖平在他的《经话》中说，他有一次去广东，在旅店见到康有为，把自己的书稿给康有为看。康有为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说他胡说八道。一年后，康有为出了一本书，和他观点一样。当然，这是廖平所说。不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他老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确实是从廖平处来。我讲这些，绝对不是要贬低康有为的书在学术上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康有为确实借用了廖平的一些思想观点，但是两者的性质不同。廖平是一位经学家，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经学讨论，没有其他目的，虽然他也有一点维新的思想，但极为有限；而康有为把经学观点变成了推行维新变法的一种理论根据，所以康有为所做的是政治活动。不管是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化史上，康有为和廖平的贡献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后来提出疑古说的是胡适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在他们的通信中，胡适首先提出了一些问题让顾颉刚去研究。有关这方面以及当时他们和钱玄同先生的讨论，都见于《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由北平朴社出版。

古史辨在当时是一场很大的思潮，它的特点是由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对于古史的一些怀疑，而顾先生怀疑古史的基础是对古书的怀疑。有关古史辨思想的一些讨论，我推荐大家读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这本书的前言是顾颉刚先生晚年的助手王煦华先生所写，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顾颉刚先生在上古史方面的观点。他首先提到，顾先生的疑古思想，从历史上看是继承了宋代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和崔述的传统，而他的治学方法和对今古文看法来自胡适和钱玄同，真正把顾先生引上考辨古史道路的则是康有为。1914年，顾颉刚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书上所说的上古史“茫昧无稽”引起他对古书所记古史的不信任，遂萌生推翻古史之志。《〈古今伪书考〉跋》是他最早写下的辨伪文字。顾先生的观点主要是认为古书，特别是经书上所载的古史，大多是从神话传说演变而来，是不同时代一层一层积累造成的，只有把充斥在古书中的许多虚妄的伪史料清除出去，才能为科学地研究我国古史扫清障碍。顾先生的这个观点，就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也就是说，他认为古史是慢慢造出来的。他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

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所以他主张在做研究时，要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起来，研究这个史事在每一时代有什么样的传说，然后研究这个史事怎样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应该说，顾先生本人及其友人，如钱玄同先生，还有他的弟子如童书业先生等，都是在“层累造成的古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古史研究的。顾先生提出的观点影响极其深远，一直到今天，其影响依然存在。

我们如何评价这场古史辨思潮？首先，无论从政治史

上看，还是从文化史上看，古史辨思潮都是进步的。它是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冲决网罗、推翻偶像的强大作用。有人说，它为后人研究扫清了障碍，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再有一点，虽然顾先生本人屡次说他受了康有为，甚至更早的如郑樵、崔述等人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顾先生所代表的五四时期的疑古和康有为时期的疑古是不一样的。因为后者是打着恢复孔教的旗号，而且康有为后来确实建立了孔教会；而顾颉刚之所以产生疑古思想，首先一点就是不相信孔子的神权性。这也就是五四时期和维新变法时期文化观的不同。

还有一点我们可以补充说一下：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一些论点，一些基本思想，应该说在他之前，在日本就有人提出了，这是事实。日本明治后期（相当于中国清末），当日本学习西学的形势已经固定之时，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思潮，即否定中国历来的古史传统，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明治四十二年，即1909年，白鸟库吉在日本东洋协会的评议会上作了一次名为“中国古传说之研究”的演讲，演讲内容后来发表在《东洋时报》上。值得注

意的是，他首先把中国的古史作为传说加以研究。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后来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他认为尧舜禹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完全是传说，而且他说，因为中国有“天地人三才”的思想，而把“天地人”变成了“尧舜禹”。这个观点在当时的日本引起了很大震动，也有许多学者起来与他辩论，其代表人物就是著名学者林泰辅。大家知道，林泰辅和罗振玉、王国维都是很好的朋友。1910年，林泰辅在日本的《汉学》杂志上发表了《论尧舜禹抹杀论》，1912年，他又在《东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再论尧舜禹抹杀论》，这两篇文章都收入了他的著作《支那上代之研究》。林泰辅从文献学、历史学的立场对白鸟库吉的理论进行了反驳。白鸟库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与我们古史辨派的理论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些学者提出：古史辨派的学者是否看过白鸟库吉的书？顾颉刚先生的绝大部分著作我都看过，包括他的笔记我也仔细读过，我个人认为，顾先生平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他确实很少读外文书，看白鸟库吉著作的事情应该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钱婉约有专门的著作，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我在这里就不详细探讨了。

当然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反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论点，代表人物是当时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先生。柳诒徵是学问非常渊博的一位学者，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化史，一直到今天还在不断翻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柳诒徵和顾颉刚的辩论见于《古史辨》第一册，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当时的学者是怎样既针锋相对，又开诚布公、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地进行辩论的。从他们的往来书信中，我们能体会到当时的学风，我想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任何两个真正称得上学者的人都不会有一模一样的论点，不但文科如此，理科、工科莫不如此。大家知道，爱因斯坦直到去世都不完全赞成量子力学，他提出了统一场论，后来人们说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是失败的，而现在的一些新理论，包括弦论、膜论等等，反而都是从统一场论这个思路发展起来的。所以，对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们不应该采取攻击、一棒子打死的态度。

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对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论点也有评论。他认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是不完整的，古史不但是层累造成的，还是层累遗忘的。我个人很拥护钱先生的这一说法。还有一位学者不得不提，就是王国维先

生。王国维先生不但参加了古史辨的讨论，而且在整个讨论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他对疑古思想有所保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意的。王国维先生是1925年到清华来讲学的，他本无意于来，是胡适先生建议，由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约聘，主持研究院建设的吴宓先生亲自到他家里敦请。后来据回忆，他本以为留学美国的吴宓一定西装革履，进屋和他握手，结果吴宓却是毕恭毕敬地对他鞠了三大躬，然后才登堂入室。他觉得这确实是真诚地请他去讲学，于是才接受了聘请。王国维先生1925年在国学研究院的课程讲义名为《古史新证》。我一直认为“古史新证”这个词与当时的古史辨思潮有关系。可能有人会反对我的说法，因为《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才出版，而《古史新证》1925年已出，怎么能倒过来说呢？其实，虽然“古史辨”这个词见于1926年，但“辨古史”却是早在1923年便出现了的。

王国维先生从清末到民初，一直是研究当时最流行的今古文问题的。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后，今古文问题就成为学术界最大的问题，在中国如此，在日本、韩国也是如此。王国维一直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他绝不是一个遗老式的人物，实际上他是最新式的学者。只不过，他的研究和任何人都不同，他没有随便写什么文章，而是专门研究中国自汉代以来什么是古文，古文问题在学术上究竟有何意义。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许许多多的论文和笔记，因此他对这些问题都有现成的看法。所以，他在1925年开设的《古史新证》课上一开头就谈到信古、疑古的问题。

《古史新证》开篇总论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当初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用“素地”这个词，后来才体会到“素地”就是 background，译法可能是从日文而来。“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一句，只有王国维先生讲出来，因为他博通中西。

后面他还专门提到《五帝本纪》，他说：“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取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而斥不雅驯之百家言；于《三代世表》，取《世本》，而斥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之《谍记》，其术至为谨慎。然好事之徒，

世多有之，故《尚书》于古今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虽斥于汉，而伪孔书则六朝以降行用，迄于今日；又汲冢所出《竹书纪年》，自夏以来皆有年数，亦《谍记》之流亚；皇甫谧作《帝王世纪》，亦为五帝三王尽加年数，后人乃复取以补太史公书，此‘信古’之过也。”他的主要意思是说，太史公不论写《五帝本纪》，还是编《三代世表》，都是非常谨慎的，而后来有些人反而采用一些不可靠的材料，把一些事情说得很准确，这是“信古派”的错误。

他也反对“疑古”：“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据王国维的学生回忆，他当时看了古史辨的一些讨论，说这些“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也就是说，王国维认为他们的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是可取的，但是对于古史的材料没有充分利用。所以，他提出了很重要的、直到今天仍有很大影响的“二重证据法”。

他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吾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这是王国维的一大贡献。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把地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互相证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结合。大家不要忘了，那是在1925年，当时中国现代的考古学还没有开始呢。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标志是1926年中国人（李济）自己主持考古田野发掘，这也是王国维参与推动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国维提出以地上的材料（即书本上的材料）和地下的材料（即考古文物材料）互相印证，形成二重证据，这是极其了不起的。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说的是，顾颉刚先生是一个胸怀极为宽广的人。大家可能不知道顾先生是怎样推荐钱穆先生的。钱穆先生本来在苏南地区教小学，最高也只教过中学。顾颉刚先生看到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稿本，就说：“你不应该教中小学，应该到大学当教授，我来介绍。”而钱穆当时正好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专门批评康有为的，那不就等于批评疑古思潮吗？他把这篇文章给顾先生看，顾先生拿回去还给他作了改订，改订以后推荐在《燕

京学报》上发表，还介绍他到燕大当教授。顾先生的这种美德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顾先生对王国维也极其尊重。在他的日记里有一段话，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与王国维先生携手同行，他感觉非常幸福。这一点，顾先生是终生不渝的。

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除了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以外，还有一位讲师，就是李济。李济先生字济之，湖北钟祥人，是我们国家在国外学习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鼻祖。李济先生在哈佛大学念人类学，受了考古学训练。他1922年回国，1923年在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策划进行考古工作，选定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夏县传说是夏都，是夏人的故里。1926年他们就来到了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因此被视为现代考古学的开端。夏县西阴村不是一个夏代的遗址，现在大家认为它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李济先生提出了“古史重建”的论点。他在这方面有两篇代表作，一是1954年发表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二是1962年发表的《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这两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古史重建”一词。他的

基本论点是在王国维的基础之上，更多偏向于考古，用考古学来重建中国的上古史。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为《古史辨》第六册作序，提出“三段论法”，即“信古、疑古、释古”。他说，最初大家都是“信古”的，“信古”之后“疑古”，归结于“释古”，这是“正反合”，符合辩证法。冯友兰先生说的“释古”，应该说和王国维、李济等的理论有共同之处。

以上我们回顾了有关五帝时代，以及上古史研究的一些讨论。关于中国古史研究的方法问题，现在不仅在中国受到重视，在国际上，特别是在西方的一些学者之间也引起很多讨论。我给大家介绍一部代表作：《剑桥中国先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该书的主编是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和美国学者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中华文史论丛》2007 年第二期上刊印了该书的序言，由夏含夷亲自翻译。

这篇序言讨论了怎样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些问题，比如其中提到，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的一些重要考

古发现，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引起了某些文献学家对中国两千年以来一直被历史学家所接受的传说的怀疑。《古史辨》乃是这一倾向最明显的代表。《古史辨》是从1926年到1941年发表的，前几册均由顾颉刚（1893—1980）编辑，收集了当时大批年轻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顾颉刚有意识地采用了考古学的术语来建立所谓‘层累’研究方法，以说明中国传统历史文献都经过改动，时间越晚近，传说的性质越浓厚，顾氏以为我们可以通过发掘这些文献所堆积的层累而回归到它最原始的核心。并且，据他说，传说的核心绝对不如后代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伟大。不但如此，他更说传统史学的工作一大部分是基于伪造的历史文献，在《古史辨》发表的论文里，曾有人对中国经典如《易经》和《尚书》表示怀疑，更不用说传统上被看作战国时代的众多子书。在倾向对事物抱有怀疑态度的西方汉学家当中，这种疑古精神自然受到热烈欢迎”。

不过，文中对这种疑古的观点，也有所保留和批评：“我们不能够完全接受这种一概疑古的态度。文献的传世过程错综复杂，几乎每一个传世文件都经过文字上的改变，这些改变中有的偶然的，有的是有意的。并且，我们也

要考虑到传世文献的代表性：无论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传统的史官和历史学家是不是只选出那些他们自己以为是正统的文献加以保留，而把他们视为异端的文献删除甚至销毁呢？关于传留下来的文献，我们也要考虑到它们的写作动机。由于传统文献的各种不同的形制，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识清这些动机。”

与此同时，文中还有另一段话：“因为出土文字资料与传统文献如此相似，所以最近有一个新的学说以为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可信。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史观相当流行。持此态度的学者因而被称为‘信古派’。这和20世纪20—30年代所谓的‘疑古派’刚好相反。对我们来说，信古派的信仰在某些方面无疑是过分的，它的爱国动机比学术依据还要强烈。因此，很多西方学者剧烈地反对这种全盘信古的观点。对此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认为每一方面都值得仔细考虑、推敲。虽然如此，也很难否认最近几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基本上证实了，而决没有推翻中国传统文献的可靠性。”

由此可见，这篇前言对于“信古”和“疑古”都是有所保留和批评的。我想，他们的这一倾向和“释古”的说

法是比较接近的，但反映了一种担心，即不要由于反对“疑古”而又走向“信古”的老路。这一点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充分接受。

2006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举行了“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此也可见，一直到今天，有关《五帝本纪》之类古史的讨论还在继续之中。最后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本书，书名叫《五帝时代研究》，作者是河南的考古学家许顺湛。这本书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系统的，试图把《五帝本纪》这一类文献材料与考古学相结合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成功与否，我想还要大家来评论。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文
本

这篇文本出自《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著。刘宋裴骃作《史记集解》，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俗称“三家注”。

史记·五帝本纪

【集解】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徐者悉是驷注解，并集众家义。【索隐】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又纪，理也，丝缕有纪。而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正义】郑玄注中候敕省图云：“德合五帝坐星者，称帝。”又坤灵图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案：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而孔安国尚书序，皇甫谧帝王世纪，孙氏注世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第者，次序之目；一者，举数之由：故曰五帝本纪第一。

礼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正义云：“左阳，故记动。右阴，故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案：春秋时置左右史，故云史记也。

黄帝者，^①少典之子，^②姓公孙，名曰轩辕。^③生而神灵，弱而能言，^④幼而徇齐，^⑤长而敦敏，成而聪明。^⑥

①【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索隐】案：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此以黄帝为五帝之首，盖依大戴礼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为然。而孔安国、皇甫谧帝王代纪及孙氏注系本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又据左传，亦号帝鸿氏也。【正义】輿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案：黄帝有熊国君，乃少典国君之次子，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祁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封泰山，禅亭亭。亭亭在牟阴。

②【集解】譙周曰：“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

非人名也。又案：国语云“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代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脩，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贾逵亦谓然，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譙周字允南，蜀人，魏散骑常侍，征不拜。此注所引者，是其人所著古史考之说也。皇甫谧字士安，晋人，号玄晏先生。今所引者，是其所作帝王代纪也。

③【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

④【索隐】弱谓幼弱时也。盖未合能言之时而黄帝即言，所以为神异也。潘岳有哀弱子篇，其子未七旬曰弱。【正义】言神异也。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书云“人惟万物之灵”，故谓之神灵也。

⑤【集解】徐广曰：“墨子曰‘年逾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

通矣’。”駉案：徇，疾；齐，速也。言圣德幼而疾速也。【索隐】斯文未是。今案：徇，齐，皆德也。书曰“聪明齐圣”，左传曰“子虽齐圣”，谓圣德齐肃也。又案：孔子家语及大戴礼并作“叡齐”，一本作“慧齐”。叡，慧，皆智也。太史公采大戴礼而为此纪，今彼文无作“徇”者。史记旧本亦有作“濬齐”。盖古字假借“徇”为“濬”，濬，深也，义亦并通。尔雅“齐”“速”俱训为疾。尚书大传曰“多闻而齐给”。郑注云“齐，疾也”。今裴氏注云徇亦训疾，未见所出。或当读“徇”为“迅”，迅于尔雅与齐俱训疾，则迅濬虽异字，而音同也。又尔雅曰“宣，徇，遍也。濬，通也”。是“遍”之与“通”义亦相近。言黄帝幼而才智周遍，且辩给也。故墨子亦云“年逾五十，则聪明心虑不徇通矣”。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谓年老逾五十不聪明，何得云“十五”？

⑥【正义】成谓年二十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此以上至“轩辕”，皆大戴礼文。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①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②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③炎帝欲侵陵诸侯，诸

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④治五气，^⑤蓺五种，^⑥抚万民，度四方，^⑦教熊罴貔貅豸虎，^⑧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⑨三战，然后得其志。^⑩蚩尤作乱，不用帝命。^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⑫遂禽杀蚩尤。^⑬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⑭披山通道，^⑮未尝宁居。

①【集解】皇甫谧曰：“易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是为炎帝。”班固曰：“教民耕农，故号曰神农。”【索隐】世衰，谓神农氏后代子孙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即班固所谓“参卢”，皇甫谧所云“帝榆罔”是也。【正义】帝王世纪云：“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蚺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括地志云：“厉山在随州随县北百里，山东有石穴。（曰）〔昔〕神农生于厉乡，所谓列山氏也。春秋时为厉国。”

②【索隐】谓用干戈以征诸侯之不朝享者。本或作“亭”，亭训直，以征诸侯之不直者。

③【集解】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记曰

‘蚩尤，庶人之贪者’。”【索隐】案：此纪云“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则蚩尤非为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盖诸侯号也。刘向别录云“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故曰三朝。凡七篇，并入大戴记”。今此注见用兵篇也。【正义】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山海经云：“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杀蚩尤。”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④【正义】振，整也。

⑤【集解】王肃曰：“五行之气。”【索隐】谓春甲乙木气，夏丙丁火气之属，是五气也。

⑥【集解】驷案：蓺，树也。诗云“蓺之荏菹”。周礼曰“谷

宜五种”。郑玄曰“五种，黍、稷、菽、麦、稻也”。【索隐】藝，种也，树也。五种即五谷也，音朱用反。此注所引见诗大雅生民之篇。尔雅云“荏菽，戎菽”也，郭璞曰“今之胡豆”，郑氏曰“豆之大者”是也。【正义】菽音鱼曳反。种音肿。

⑦【集解】王肃曰：“度四方而安抚之。”【正义】度音徒洛反。

⑧【索隐】书云“如虎如貔”，尔雅云“貔，白狐”，礼曰“前有摯兽，则载貔貅”是也。尔雅又曰“貙獾似狸”。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周礼有服不氏，掌教抚猛兽。即古服牛乘马，亦其类也。【正义】熊音雄。罴音碑。貔音毗。貅音休。貙音丑于反。罴如熊，黄白色。郭璞云：“貔，执夷，虎属也。”案：言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

⑨【集解】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正义】阪音白板反。括地志云：“阪泉，今名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东北，与涿水合。又有涿鹿故城，在妫州东南五十里，本黄帝所都也。晋太康地里志云‘涿鹿城东一里有阪泉，上有黄帝祠’。”案：阪泉之野则平野之地也。

⑩【正义】谓黄帝克炎帝之后。

⑪【正义】言蚩尤不用黄帝之命也。

⑫【集解】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隐】或作“濁鹿”，古今字异耳。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县，然则服虔云“在涿郡”者，误也。

⑬【集解】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或曰，黄帝斩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绝辮之野”。注“皇览”书名也。记先代冢墓之处，宜皇王之省览，故曰皇览。是魏人王象、缪袭等所撰也。

⑭【正义】平服者即去之。

⑮【集解】徐广曰：“披，他本亦作‘陂’。字盖当音波，陂者旁其边之谓也。披语诚合今世，然古今不必同也。”

【索隐】披音如字，谓披山林草木而行以通道也。徐广音波，恐稍纡也。

东至于海，登丸山，^①及岱宗。^②西至于空桐，^③登

鸡头。^④南至于江，登熊、湘。^⑤北逐荤粥，^⑥合符釜山，^⑦而邑于涿鹿之阿。^⑧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⑨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⑩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⑪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⑫获宝鼎，迎日推策。^⑬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⑭以治民。顺天地之纪，^⑮幽明之占，^⑯死生之说，^⑰存亡之难。^⑱时播百谷草木，^⑲淳化鸟兽虫蛾，^⑳旁罗日月星辰水波^㉑土石金玉，^㉒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㉓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㉔

①【集解】徐广曰：“丸，一作‘凡’。”驷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虚县。【索隐】注“丸，一作‘凡’”，凡音扶严反。【正义】丸音桓。括地志云：“丸山即丹山，在青州临朐县界朱虚故县西北二十里，丹水出焉。”丸音紈。守节案：地志唯有凡山，盖凡山丸山是一山耳。诸处字误，或“丸”或“凡”也。汉书郊祀志云“禅丸山”，颜师古云“在朱虚”，亦与括地志相合，明丸山是也。

②【正义】泰山，东岳也。在兖州博城县西北三十里也。

③【集解】应劭曰：“山名。”韦昭曰：“在陇右。”

④【索隐】山名也。后汉王孟塞鸡头道，在陇西。一曰崆峒山之别名。【正义】括地志云：“空桐山在肃州

福祿县东南六十里。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即此山。”括地志又云：“笄头山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禹贡泾水所出。輿地志云或即鸡头山也。酈元云盖大陇山异名也。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盖在此。”案：二处崆峒皆云黄帝登之，未详孰是。

⑤【集解】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正义】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州上洛县西十里，齐桓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觚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

⑥【集解】匈奴传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索隐】匈奴别名也。唐虞已上曰山戎，亦曰熏粥，夏曰淳维，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正义】荤音薰。粥音育。

⑦【索隐】合诸侯符契圭瑞，而朝之于釜山，犹禹会诸侯于涂山然也。又案：郭子横洞冥记称东方朔云“东海大明之墟有釜山，山出瑞云，应王者之符命”，如尧时有赤云之祥之类。盖黄帝黄云之瑞，故曰“合符应于釜山”也。【正义】括地志云：“釜山在妫州怀戎县北三里，山

上有舜庙。”

⑧【正义】广平曰阿。涿鹿，山名，已见上。涿鹿故城在山下，即黄帝所都之邑于山下平地。

⑨【正义】环绕军兵为营以自卫，若辕门即其遗象。

⑩【集解】应劭曰：“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张晏曰：“黄帝有景云之应，因以名师与官。”

⑪【正义】监，上监去声，下监平声。若周邵分陕也。

⑫【集解】徐广曰：“多，一作‘朋’。”【索隐】与音羊汝反。与犹许也。言万国和同，而鬼神山川封禅祭祀之事，自古以来帝皇之中，推许黄帝以为多。多犹大也。

⑬【集解】晋灼曰：“策，数也，迎数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来而推之，故曰迎日。”【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著也。黄帝得著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正义】笑音策。迎，逆也。黄帝受神笑，命大挠造甲子，容成造历是也。

⑭【集解】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大鸿，见封禅书。【正义】举，任用。四人

皆帝臣也。帝王世纪云：“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者也。驱羊数万群，能牧民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进以为将。黄帝因著占梦经十一卷。”艺文志云：“风后兵法十三篇，图二卷，孤虚二十卷，力牧兵法十五篇。”郑玄云：“风后，黄帝之三公也。”案：黄帝仰天地置列侯众官，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也。封禅书云“鬼臾区号大鸿，黄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鸿冢是”。艺文志云“鬼容区兵法三篇”也。

⑮【正义】言黄帝顺天地阴阳四时之纪也。

⑯【正义】幽，阴；明，阳也。占，数也。言阴阳五行，黄帝占数而知之。此文见大戴礼。

⑰【集解】徐广曰：“一云‘幽明之教，合死生之说’。”

【正义】说谓仪制也。民之生死。此谓作仪制礼则之说。

⑱【索隐】存亡犹安危也。易曰“危者安其位，亡者保其存”是也。难犹说也。凡事是非未尽，假以往来之词，则

曰难。又上文有“死生之说”，故此云“存亡之难”，所以韩非著书有说林、说难也。【正义】难音乃憚反。存亡犹生死也。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

①9【集解】王肃曰：“时，是也。”【索隐】为一句。【正义】言顺四时之所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也。

②0【索隐】为一句。蛾音牛綺反。一作“豸”。（豸）言淳化广被及之。【正义】蛾音鱼起反。又音豸，豸音直氏反。蚁，蚍蜉也。尔雅曰：“有足曰虫，无足曰豸。”

②1【集解】徐广曰：“一作‘沃’。”

②2【索隐】旁，非一方。罗，广布也。今案：大戴礼作“历离”。离即罗也。言帝德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及至土石金玉。谓日月扬光，海水不波，山不藏珍，皆是帝德广被也。【正义】旁罗犹遍布也。日月，阴阳时节也。星，二十八宿也。辰，日月所会也。水波，澜漪也。言天不异灾，土无别害，水少波浪，山出珍宝。

②3【正义】节，时节也。水，陂障决泄也。火，山野禁放也。材，木也。物，事也。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收采禁捕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大戴礼云

“宰我问于孔子曰：予闻荣伊曰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耶？何以至三百年？孔子曰：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

②4【索隐】炎帝火，黄帝土代之，即“黄龙地螾见”是也。

螾，土精，大五六围，长十馀丈。螾音引。【正义】螾音以刃反。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①

①【索隐】旧解破四为三，言得姓十三人耳。今案：国语胥臣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葳、任、荀、僖、姁、僮、衣是也。唯青阳与夷鼓同己姓”。又云“青阳与苍林为姬姓”。是则十四人为十二姓，其文甚明。唯姬姓再称青阳与苍林，盖国语文误，所以致令前儒共疑。其姬姓青阳当为玄器，是帝誉祖本与黄帝同姬姓。其国语上文青阳，即是少昊金天氏为己姓者耳。既理在不疑，无烦破四为三。

黄帝居轩辕之丘，^①而娶于西陵之女，^②是为嫫祖。^③嫫祖为黄帝正妃，^④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器，是为

青阳，^⑤青阳降居江水；^⑥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⑦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⑧黄帝崩，^⑨葬桥山。^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①【集解】皇甫谧曰：“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山海经曰‘在穷山之际，西射之南’。”张晏曰：“作轩冕之服，故谓之轩辕。”

②【正义】西陵，国名也。

③【集解】徐广曰：“祖，一作‘俎’。嫫，力追反。”【索隐】一曰雷祖，音力堆反。【正义】一作“嫫”。

④【索隐】案：黄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案：国语夷鼓、苍林是二人。又案：汉书古今人表彤鱼氏生夷鼓，嫫母生苍林，不得如谧所说。太史公乃据大戴礼，以累祖生昌意及玄器，玄器即青阳也。皇甫谧以青阳为少昊，乃方雷氏所生，是其所见异也。

⑤【索隐】玄器，帝尝之祖。案：皇甫谧及宋衷皆云玄器青阳即少昊也。今此纪下云“玄器不得在帝位”，则

太史公意青阳非少昊明矣。而此又云“玄器是为青阳”，当是误也。谓二人皆黄帝子，并列其名，所以前史因误以玄器青阳为一耳。宋衷又云：“玄器青阳是为少昊，继黄帝立者，而史不叙，盖少昊金德王，非五运之次，故叙五帝不数之也。”

⑥【正义】括地志云：“安阳故城在豫州新息县西南八十里。应劭云古江国也。地理志亦云安阳古江国也。”

⑦【索隐】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降居江水、〔若水〕。江水、若水皆在蜀，即所封国也。水经曰“水出旄牛徼外，东南至故关为若水，南过邛都，又东北至朱提县为卢江水”，是蜀有此二水也。

⑧【正义】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为子昌意娶蜀山氏，后子孙因封焉。帝颡项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母曰昌仆，亦谓之女枢。”河图云：“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于幽房之宫，生颡项，首戴干戈，有德文也。”

⑨【集解】皇甫谧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

【索隐】案：大戴礼“宰我问孔子曰：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何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至三百年乎？对曰：生

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则士安之说略可凭矣。【正文】列仙传云：“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

⑩【集解】皇览曰：“黄帝冢在上郡桥山。”【索隐】地理志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山有黄帝冢也。【正义】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地理志云上郡阳周县桥山南有黄帝冢。”案：阳周，隋改为罗川。尔雅云山锐而高曰桥也。

帝颛顼高阳者，^①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②载时^③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④治气^⑤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北至于幽陵，^⑥南至于交阯，^⑦西至于流沙，^⑧东至于蟠木。^⑨动静之物，^⑩大小之神，^⑪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⑫

①【集解】皇甫谧曰：“都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索隐】宋衷云：“颛顼，名；高阳，有天下号也。”张晏云：“高阳者，所兴地名也。”

②【索隐】言能养材物以任地。大戴礼作“养财”。

③【索隐】载，行也。言行四时以象天。大戴礼作“履时以

象天”。履亦践而行也。

④【索隐】鬼神聪明正直，当尽心敬事，因制尊卑之义，故礼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是也。【正文】鬼之灵者曰神也。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也，故已依冯之制义也。制，古制字。

⑤【索隐】谓理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人也。

⑥【正义】幽州也。

⑦【正义】陟音止，交州也。

⑧【集解】地理志曰流沙在张掖居延县。【正义】济，渡也。括地志云：“居延海南，甘州张掖县东北千六十四里是。”

⑨【集解】海外经曰：“东海中有一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东北有门，名曰鬼门，万鬼所聚也。天帝使神人守之，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阅领万鬼。若害人之鬼，以苇索缚之，射以桃弧，投虎食也。”

⑩【正义】动物谓鸟兽之类，静物谓草木之类。

⑪【正义】大谓五岳、四渎，小谓丘陵坟衍。

⑫【集解】王肃曰：“砥，平也。四远皆平而来服属。”【索隐】依王肃音止蜀，据大戴礼作“砥砺”也。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①颛顼崩，^②而玄囂之孙高辛立，是为帝誉。

①【索隐】系本作“穷係”。宋衷云：“一云穷係，溢也。”

【正义】帝舜之高祖也。

②【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皇览曰：“颛顼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顿丘者城门，名顿丘道。”【索隐】皇甫谧云：“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又山海经曰：“颛顼葬鲋鱼山之阳，九嫔葬其阴。”

帝誉高辛者，^①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蛸极，^②蛸极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黄帝。自玄囂与蛸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③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①【集解】张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高阳，高辛皆所兴之地名；颛顼与誉皆以字为号：上古质故也。”【索隐】宋衷曰：“高辛地名，因以为号。誉，名也。”皇甫谧云：“帝誉名爰也。”【正义】帝王纪云：“倍母无闻焉。”

②【正义】蛸音居兆反。本作“桥”，音同。又巨遥反。帝尧之祖也。

③【集解】皇甫谧曰：“都毫，今河南偃师是。”

高辛生而神灵，自言其名。^①普施利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②明鬼神而敬事之。^③其色郁郁，其德嶷嶷。^④其动也时，其服也士。^⑤帝尝溉执中而遍天下，^⑥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⑦

①【正义】帝王经云：“帝倍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蚩。韶訖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颡项，三十登位，都毫，以人事纪官也。”

②【正义】言作历弦、望、晦、朔，日月未至而迎之，过而送之，上“迎日推策”是也。

③【正义】天神曰神，人神曰鬼。又云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人之精气谓之鬼。言明识鬼神而敬事也。

④【索隐】郁郁犹穆穆也。嶷嶷，德高也。今案：大戴礼“郁”作“神”，“嶷”作“俟”。

⑤【索隐】举动应天时，衣服服士服，言其公且廉也。

⑥【集解】徐广曰：“古‘既’字作水旁。‘遍’字一作‘尹’。”【索隐】即尚书“允执厥中”是也。【正义】

溉音既。言帝倍治民，若水之溉灌，平等而执中正，遍于天下也。

⑦【正义】以上大戴文也。

帝啻娶陈锋氏女，^①生放勳。^②娶媯訾氏女，生摯。^③帝啻崩，^④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⑤而弟放勳立，是为帝尧。

①【索隐】锋音峰。案：系本作“陈鄴氏”。皇甫谧云“陈锋氏女曰庆都”。庆都，名也。【正义】锋音峰。又作“豐”。帝王纪云“帝倍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邠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娥氏女，曰简狄，生尧。次妃陈豐氏女，曰庆都，生放勳。次妃媯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摯”也。

②【正义】放音方往反。勳亦作“勳”，音许云反。言尧能放上代之功，故曰放勳。溢尧。姓伊祁氏。帝王纪云：“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庆都，十四月生尧。”

③【索隐】案：皇甫谧云“女名常宜”也。【正义】媯，足须反。訾，紫移反。

④【集解】皇甫谧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皇览曰：“帝啻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

⑤【索隐】古本作“不著”，音张虑反。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明。卫宏云：“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禅位焉。”【正义】帝王纪云：“帝摯之母于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于兄弟最长，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勳为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摯服其义，乃率群臣造唐而致禅。唐侯自知有天命，乃受帝禅。乃封摯于高辛。”今定州唐县也。

帝尧者，^①放勳。^②其仁如天，^③其知如神。^④就之如日，^⑤望之如云。^⑥富而不骄，贵而不舒。^⑦黄收纯衣，^⑧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⑨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⑩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①【集解】谥法曰：“翼善传圣曰尧。”【索隐】尧，谥也。

放勳，名。帝啻之子，姓伊祁氏。案：皇甫谥云“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孺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正义】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

②【集解】徐广曰：“号陶唐。”皇甫谧曰：“尧以甲申岁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征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③【索隐】如天之函养也。

④【索隐】如神之微妙也。

⑤【索隐】如日之照临，人咸依就之，若葵藿倾心以向日也。

⑥【索隐】如云之覆渥，言德化广大而浸润生人，人咸仰望之，故曰如百谷之仰青雨也。

⑦【索隐】舒犹慢也。大戴礼作“不豫”。

⑧【集解】徐广曰：“纯，一作‘紃’。”驷案：太古冠冕图云“夏名冕曰收”。礼记曰“野夫黄冠”。郑玄曰“纯衣，士之祭服”。【索隐】收，冕名。其色黄，故曰黄收，象古质素也。纯，读曰缙。

⑨【集解】徐广曰：“驯，古训字。”【索隐】史记“驯”字徐广皆读曰训。训，顺也。言圣德能顺人也。案：尚书作“俊德”，孔安国云“能明用俊德之士”，与此文意别也。

⑩【集解】徐广曰：“下云‘便程东作’，然则训平为便也。”驷案：尚书并作“平”字。孔安国曰“百姓，百官”。郑玄曰“百姓，群臣之父子兄弟”。【索隐】古文尚书作“平”，

此文盖读“平”为蒲耕反。平既训便，因作“便章”。其今文作“辩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缘反。便则训辩，遂为辩章。邹诞生本亦同也。

乃命羲、和，^①敬顺昊天，^②数法^③日月星辰，^④敬授民时。^⑤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⑥敬道日出，便程东作。^⑦日中，星鸟，以殷中春。^⑧其民析，鸟兽字微。^⑨申命羲叔，居南交。^⑩便程南为，敬致。^⑪日永，星火，以正中夏。^⑫其民因，鸟兽希革。^⑬申命和仲，^⑭居西土，^⑮曰昧谷。^⑯敬道日入，便程西成。^⑰夜中，星虚，^⑱以正中秋。^⑲其民夷易，鸟兽毛毳。^⑳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㉑便在伏物。^㉒日短，星昴，以正中冬。^㉓其民燠，鸟兽氄毛。^㉔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㉕信饬^㉖百官，众功皆兴。

①【集解】孔安国曰：“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正义】吕刑传云：“重即羲，黎即和，虽别为氏族，而出自重黎也。”案：圣人不独治，必须贤辅，乃命相天地之官，若周礼天官卿、地官卿也。

②【正义】敬犹恭勤也。元气昊然广大，故云昊天。释天云：“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而独言

昊天者，以尧能敬天，大，故以昊大言之。

③【索隐】尚书作“历象日月”，则此言“教法”，是训“历象”二字，谓命羲和以历数之法观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时也。

④【正义】历数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递中之星，日月所会之辰，定其天数，以为一岁之历。

⑤【正义】尚书考灵耀云：“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也。”天子视四星之中，知民缓急，故云敬授民时也。

⑥【集解】尚书作“嵎夷”。孔安国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日出于暘谷。羲仲，治东方之官。”【索隐】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案：淮南子曰“日出汤谷，浴于咸池”，则汤谷亦有他证明矣。又下曰“昧谷”，徐广云“一作‘柳’”，柳亦日入处地名。太史公博采经记而为此史，广记异闻，不必皆依尚书。盖郁夷亦地之别名也。

【正义】郁音隅。阳或作“暘”。禹贡青州云：“嵎夷既略。”案：嵎夷，青州也。尧命羲仲理东方青州嵎夷之地，日所出处，名曰阳明之谷。羲仲主东方之官，若周礼

春官卿。

- ⑦【集解】孔安国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索隐】刘伯庄传皆依古史作平秩音。然尚书大传曰“辨秩东作”，则是训秩为程，言便课其作程者也。【正义】道音导。便，程，并如字，后同。导，训也。三春主东，故言日出。耕作在春，故言东作。命羲仲恭勤道训万民东作之事，使有程期。
- ⑧【集解】孔安国曰：“日中谓春分之日也。鸟，南方朱鸟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鸟星毕见，以正仲春之节气。转以推孟、季，则可知也。”【正义】下“中”音仲，夏、秋、冬并同。
- ⑨【集解】孔安国曰：“春事既起，丁壮就功，言其民老壮分析也。”乳化曰字。尚书“微”作“尾”字。说（文）云“尾，交接也”。
- ⑩【集解】孔安国曰：“夏与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索隐】孔注未是。然则冬与秋交，何故下无其文？且东嵎夷，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独不言地，乃云与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略举一字名地，南交则是交阯不疑也。【正义】羲叔主南方官，若周礼夏官卿也。

- ⑪【集解】孔安国曰：“为，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索隐】为依字读。春言东作，夏言南为，皆是耕作营为劝农之事。孔安国强读为“讹”字，虽则训化，解释亦甚纡回也。【正义】为音于伪反。命羲叔宜恭勤民事。致其种植，使有程期也。
- ⑫【集解】孔安国曰：“永，长也，谓夏至之日。火，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也，以正中夏之〔气〕节。”马融、王肃谓日长昼漏六十刻，郑玄曰五十五刻。
- ⑬【集解】孔安国曰：“因，谓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壮以助农也。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也。革，改也。”
- ⑭【正义】和仲主西方之官，若周礼秋官卿也。
- ⑮【集解】徐广曰：“一无‘土’字。以为西者，今天水之西县也。”驷案：郑玄曰“西者，陇西之西，今人谓之兑山”。
- ⑯【集解】徐广曰：“一作‘柳谷’。”驷案：孔安国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
- ⑰【集解】孔安国曰：“秋，西方，万物成也。”
- ⑱【索隐】虚，旧依字读，而邹诞生音墟。案：虚星主坟墓，

邹氏或得其理。

①⑨【集解】孔安国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备也。虚，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也。”

②⑩【集解】孔安国曰：“夷，平也。老壮者在田，与夏平也。毡，理也。毛更生（曰）整理。”

③⑪【集解】孔安国曰：“北称幽都，谓所聚也。”【索隐】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盖是也。【正义】案：北方幽州，阴聚之地，命和叔居理之。北方之官，若周礼冬官卿。

④⑫【索隐】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尚书作“平在朔易”。今案：大传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据之而书。

⑤⑬【集解】孔安国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节也。”马融、王肃谓日短昼漏四十刻。郑玄曰四十五刻，失之。

⑥⑭【集解】徐广曰：“鼯音茸。”驷案：孔安国曰“民入室处，鸟兽皆生鼯毳细毛以自温也”。

⑦⑮【索隐】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度数也。而日行迟，一岁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日一日行

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强，月行天一匝，又逐及日而与会。一年十二会，是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过半。年分出小月六，是每岁馀六日。又大岁三百六十六日，小岁三百五十五日，举全数云六十六日。其实一岁唯馀十一日弱。未及三岁，已成一月，则置闰。若三年不置闰，则正月为二月。九年差三月，则以春为夏。十七年差六月，则四时皆反。以此四时不正，岁不成矣。故传曰“归馀于终，事则不悖”是也。

②【集解】徐广曰：“古‘勅’字。”

尧曰：“谁可顺此事？”^①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②尧曰：“吁！顽凶，不用。”^③尧又曰：“谁可者？”灌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④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⑤尧又曰：“嗟，四岳，^⑥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⑦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⑧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⑨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⑩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⑪

①【正义】言将登用之嗣位也。

②【集解】孔安国曰：“放齐，臣名。”【正义】放音方往反。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

案：开，解而达也。帝王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水故为县。”

③【集解】孔安国曰：“吁，疑怪之辞。”【正义】左传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囂，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凶，讼也。言丹朱心既顽囂，又好争讼，不可用之。

④【集解】孔安国曰：“灌兜，臣名。”郑玄曰：“共工，水官名。”【正义】兜音斗侯反。

⑤【正义】漫音莫干反。共工善为言语，用意邪僻也。似于恭敬，罪恶漫天，不可用也。

⑥【集解】郑玄曰：“四岳，四时官，主方岳之事。”【正义】嗟叹鸿水，问四岳谁能理也。孔安国云：“四岳，即上羲和四子也。分掌四岳之诸侯，故称焉。”

⑦【集解】孔安国曰：“怀，包；襄，上也。”【正义】汤音商，今读如字。荡荡，广平之貌。言水奔突有所涤除，地上之物为水漂流荡荡然。案：怀，藏，包裹之义，故怀为包。释言以襄为驾，驾乘牛马皆在上也。言水襄上乘陵，浩浩盛大，势若漫天。

⑧【集解】马融曰：“鲧，臣名，禹父。”

⑨【正义】负音佩，依字通。负，违也。族，类也。鲧性很戾，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可用也。诗云“贪人败类”也。

⑩【正义】异音异。孔安国云：“异，已；已，退也。言余人尽已，唯鲧可试，无成乃退。”

⑪【正义】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云：“各自纪事，示不相袭也。”孙炎云：“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禾谷一熟也。载，取万物终更始也。载者，年之别名，故以载为年也。”案：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也。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而用其子禹也。

尧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践朕位？”^①岳应曰：“鄙德忝帝位。”^②尧曰：“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众皆言于尧曰：“有矜在民间，曰虞舜。”^③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顽，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④尧曰：“吾其试哉。”^⑤于是尧妻之二女，^⑥观其德于二女。^⑦舜飭下二女于妫汭，^⑧如妇礼。尧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⑨五典能从。乃遍

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⑩尧使舜入山林^⑪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召舜曰：“女谋事至而言可绩，三年矣。^⑫女登帝位。”舜让于德不怿。^⑬正月上日，^⑭舜受终于文祖。文祖者，尧大祖也。^⑮

①【集解】郑玄曰：“言汝诸侯之中有能顺事用天命者，入处我位，统治天子之事者乎？”【正义】孔安国云：“尧年十六，以唐侯升为天子，在位七十载，时八十六，老将求代也。”

②【正义】四岳皆云，鄙俚无德，若便行天子事，是辱帝位。言己等不堪也。

③【集解】孔安国曰：“无妻曰矜。”【正义】矜，古顽反。

④【集解】孔安国曰：“不至于奸恶。”【正义】烝，之升反，进也。言父顽，母嚚，弟傲，舜皆和以孝，进之于善，不至于奸恶也。

⑤【正义】欲以二女试舜，观其理家之道也。

⑥【正义】妻音七计反。二女，娥皇、女英也。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舜升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

⑦【正义】视其为德行于二女，以理家而观国也。

⑧【集解】孔安国曰：“舜所居妫水之汭。”【索隐】列女传

云二女长曰娥皇，次曰女英。系本作“女莹”。大戴礼作“女医”。皇甫谧云：“妫水在河东虞乡县历山西。汭，水涯也，犹洛汭、渭汭然也。”【正义】仿音敕。下音胡亚反。汭音芮。舜能整齐二女以义理，下二女之心于妫汭，使行妇道于虞氏也。括地志云：“妫汭水源出蒲州河东南山。许慎云：水涯曰汭。案：地记云‘河东郡青山东山中有二泉，下南流者妫水，北流者汭水。二水异源，合流出谷，西注河。妫水北曰汭也’。又云‘河东县二里故蒲坂城，舜所都也。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

⑨【集解】郑玄曰：“五典，五教也。盖试以司徒之职。”

⑩【集解】马融曰：“四门，四方之门。诸侯群臣朝者，舜宾迎之，皆有美德也。”

⑪【索隐】尚书云“纳于大麓”，穀梁传云“林属于山曰麓”，是山足曰麓，故此以为入山林不迷。孔氏以麓训录，言令舜大录万几之政，与此不同。

⑫【集解】郑玄曰：“三年者，宾四门之后三年也。”

⑬【集解】徐广曰：“音亦。今文尚书作‘不怡’。怡，怵

也。”【索隐】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恻也。谓辞让于德不堪，所以心意不悦恻也。俗本作“泽”，误尔，亦当为“恻”。

⑭【集解】马融曰：“上日，朔日也。”【正义】郑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故依尧正月上日也。”

⑮【集解】郑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

【索隐】尚书帝命验曰：“五府，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唐虞谓之五府，夏谓世室，殷谓重屋，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正义】舜受尧终帝之事于文祖也。尚书帝命验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也。五府者，黄曰神斗。”注云：“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燮怒之府，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祖。周曰明堂。神斗者，黄帝含枢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静，四行之主，故谓之神斗。周曰太室。显纪者，白帝招拒之府，名显纪。纪，法也。金精断割万物，故谓之显纪。周曰总章。玄矩者，黑帝汁光纪之府，名曰

玄矩。矩，法也。水精玄味，能权轻重，故谓之玄矩。

周曰玄堂。灵府者，苍帝灵威仰之府，名曰灵府。周曰青阳。”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①遂类于上帝，^②禋于六宗，^③望于山川，^④辩于群神。^⑤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⑥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⑦望秩于山川。^⑧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⑨同律度量衡，^⑩修五礼^⑪五玉^⑫三帛^⑬二生^⑭一死^⑮为挚，^⑯如五器，卒乃复。^⑰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归，至于祖祢庙，^⑱用特牛礼。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⑲徧告以言，^⑳明试以功，车服以庸。^㉑肇十有二州，决川。^㉒象以典刑，^㉓流宥五刑，^㉔鞭作官刑，^㉕扑作教刑，^㉖金作赎刑。^㉗眚灾过，赦；^㉘怙终^㉙贼，刑。^㉚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㉛

①【集解】郑玄曰：“璇玑，玉衡，浑天仪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正义】说文云：“璇，赤玉也。”案：舜虽受尧命，犹不自安，更以璇玑玉衡以正天文。玑为运转，衡为横箫，运玑使动于下，以衡望之，是王者正天文器也，观其齐与不齐。今七政齐，则已受禅为是。蔡邕云：“玉

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并县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而强也。”郑玄云：“运转者为玑，持正者为衡。”尚书大传云：“政者，齐中也。谓春夏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道正而万事顺成，故天道政之大也。”

②【集解】郑玄曰：“礼祭上帝于圜丘。”【正义】五经异义云：“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时舜告摄，非常祭也。”王制云：“天子将出，类于上帝。”郑玄云：“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

③【集解】郑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也。”駉案：六宗义众矣。愚谓郑说为长。【正义】周语云“精意以享曰禋”也。孙炎云：“禋，絜敬之祭也。”案：星，五纬星也。辰，日月所会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孔安国云：“四时寒暑也，日月星也，水旱也。”礼祭法云：“埋少牢于大昭，祭时也。禋祈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禘，祭星。雩禘，祭水旱也。”司马彪续汉书云：“安帝立六宗，祀于洛阳城西北亥地，礼比大社。魏因之。至晋初，荀颀言新

祀，以六宗之神诸家说不同，乃废之也。”

④【集解】徐广曰：“名山大川。”【正义】望者，遥望而祭山川也。山川，五岳、四渎也。尔雅云：“梁山，晋望也。”

⑤【集解】徐广曰：“辩音班。”驷案：郑玄曰“群神若丘陵坟衍”。【正义】辩音遍。谓祭群神也。

⑥【集解】马融曰：“揖，敛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尧将禅舜，使群牧敛之，使舜亲往班之。”

【正义】揖音集。周礼典瑞云：“王执镇圭，尺二寸。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七寸。伯执躬圭，五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言五瑞者，王不在中也。”孔文祥云：“宋末，会稽修禹庙，于庙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馀枚，形与周礼同，皆短小。此即禹会诸侯于会稽，执以礼山神而埋之。其璧今犹有在也。”

⑦【集解】马融曰：“舜受终后五年之二月。”郑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东岳者，考绩。柴，燎也。”【正义】案：既班瑞群后即东巡者，守土之诸侯会岱宗之岳，焚柴告至也。王者巡狩，以诸侯自专一国，威福任己，恐其壅遏上命，泽不下流，故巡行问人疾苦也。风俗通云：“太

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始也，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也。”案：二月，仲月也。仲，中也，言得其中也。

⑧【正义】乃以秩望祭东方诸侯境内之名山大川也。言秩者，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⑨【集解】郑玄曰：“协正四时之月数及日名，备有失误。”

【正义】既见东方君长，乃合同四时气节，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齐一也。周礼：“太史掌正岁年以序事，颁正朔于邦国。”则节气晦朔皆天子颁之。犹恐诸侯国异，或不齐同，因巡狩合正之。

⑩【集解】郑玄曰：“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两也。”【正义】律之十二律，度之丈尺，量之斗斛，衡之斤两，皆使天下相同，无制度长短轻重异也。汉律历志云：“虞书云‘同律度量衡’，所以齐远近，立民信也。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无射。吕以旅阳宣气，一曰林钟，二曰南吕，三曰应钟，四曰大吕，五曰夹钟，六曰中吕。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管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尺，十尺为

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黄钟之龠，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为一龠，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而五权谨矣。衡，平也。权重也。”

⑪【集解】马融曰：“吉、凶、宾、军、嘉也。”【正义】

周礼“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也。尚书尧典云“类于上帝”，吉礼也；“如丧考妣”，凶礼也；“群后四朝”宾礼也；大禹谟云“汝徂征”，军礼也；尧典云“女子时”，嘉礼也。女音女虑反。

⑫【集解】郑玄曰：“即五瑞也。执之曰瑞，陈列曰玉。”

⑬【集解】马融曰：“三孤所执也。”郑玄曰：“帛，所以荐

玉也。必三者，高阳氏后用赤缙，高辛氏后用黑缙，其余诸侯皆用白缙。”【正义】孔安国云：“诸侯世子执纁，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也。”案：三统纪推伏羲为天统，色尚赤。神农为地统，色尚黑。黄帝为人统，色尚

白。少昊，黄帝子，亦尚白。故高阳氏又天统，亦尚赤。尧为人统，故用白。

⑭【正义】羔、雁也。郑玄注周礼大宗伯云：“羔，小羊也，取其群不失其类也。雁，取其候时而行也。卿执羔，大夫执雁。”案：羔、雁性驯，可生为贄。

⑮【正义】雉也。马融云：“一死雉，士所执也。”案：不可生为贄，故死。雉，取其守介死不失节也。

⑯【集解】马融曰：“挚：二生，羔、雁，卿大夫所执；一死，雉，士所执。”【正义】挚音至。贄，执也。郑玄云：“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韦昭云：“贄，六贄：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也。”

⑰【集解】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礼终则还之，三帛已下不还也。”【正义】卒音子律反。复音伏。

⑱【正义】祔音乃礼反。何休云：“生曰父，死曰考，庙曰祔。”

⑲【集解】郑玄曰：“巡狩之年，诸侯见于方岳之下。其间四年，四方诸侯分来朝于京师也。”

⑳【正义】徧音遍。言遍告天子治理之言也。

㉑【正义】孔安国云：“功成则锡车服，以表显其能用也。”

- ②【集解】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燕、齐辽远，分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于是为十二州也。”郑玄曰：“更为之定界，浚水害也。”
- ③【集解】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无犯之者，但有其象，无其人也。”【正义】孔安国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
- ④【集解】马融曰：“流，放；宥，宽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正义】孔安国云：“以流放之法宽五刑也。”郑玄云：“三宥，一曰弗识，二曰过失，三曰遗忘也。”
- ⑤【集解】马融曰：“为辨治官事者为刑。”
- ⑥【集解】郑玄曰：“扑，檠楚也。扑为教官为刑者。”
- ⑦【集解】马融曰：“金，黄金也。意善功恶，使出金赎罪，坐不戒慎者。”
- ⑧【集解】郑玄曰：“眚灾，为人作患者也。过失，虽有害则赦之。”
- ⑨【集解】徐广曰：“一作‘众’。”
- ⑩【集解】郑玄曰：“怙其奸邪，终身以为残贼，则用刑之。”

⑩【集解】徐广曰：“今文云‘惟刑之讙哉’。尔雅曰‘讙，静也’。”【索隐】注“惟形之讙哉”，案：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诵，恤讙声近，遂作“讙”也。

灌兜进言共工，^①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②共工果淫辟。^③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④在江淮、荆州^⑤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⑥以变北狄；^⑦放驩兜于崇山，^⑧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⑨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⑩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①【正义】灌兜，浑沌也。共工，穷奇也。鲧，桡杓也。三苗，鬻鬻也。左传云“舜臣尧，流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也。

②【正义】工师，若今大匠卿也。

③【正义】匹亦反。

④【集解】马融曰：“国名也。”【正义】左传云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孔安国云：“缙云氏之后为诸侯，号鬻鬻也。”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案：洞庭，湖名，在岳州巴陵西南一里，南与青草湖连。彭蠡，湖名，在江州浔阳县东南五十二里。以

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为左，彭蠡在东为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

⑤【集解】淮，读曰匯，音胡罪反，今彭蠡湖也。本属荆州。尚书云“南入于江，东匯泽为彭蠡”是也。

⑥【集解】马融曰：“北裔也。”【正义】尚书及大戴礼皆作“幽州”。括地志云：“故冀城在檀州燕乐县界。故老传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神异经云：“西北荒有人焉，人面，朱鬣，蛇身，人手足，而食五谷禽兽，顽愚，名曰共工。”

⑦【集解】徐广曰：“变，一作‘變’。”【索隐】变谓变其形及衣服，同于夷狄也。徐广云作“變”。變，和也。【正义】言四凶流四裔，各于四夷放共工等为中国之风俗也。

⑧【集解】马融曰：“南裔也。”【正义】神异经云：“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鸟喙而有翼，两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鱼，为人很恶，不畏风雨禽兽，犯死乃休，名曰驩兜也。”

⑨【集解】马融曰：“西裔也。”【正义】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神异经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

手足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又山海经云大荒北经“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也。

⑩【集解】马融曰：“殛，诛也。羽山，东裔也。”【正义】殛音纪力反。孔安国云：“殛，窜，放，流，皆诛也。”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神异经云：“东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为人自用，欲为欲息，皆（曰）云是鲧也。”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①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②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③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④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⑤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⑥是为帝舜。

①【集解】徐广曰：“尧在位凡九十八年。”驷案：皇览曰“尧冢在济阴城阳。刘向曰‘尧葬济阴，丘垅皆小’。吕氏

春秋曰‘尧葬穀林’。”皇甫谧曰“穀林即城阳。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正义】皇甫谧云：“尧即位九十八年，通舜摄二十八年也，凡年百一十七岁。”孔安国云：“尧寿百一十六岁。”括地志云：“尧陵在濮州雷泽县西三里。郭缘生述征记云‘城阳县东有尧冢，亦曰尧陵，有碑’是也。”括地志云：“雷泽县本汉城阳县也。”

②【正义】尚书“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是也。

③【索隐】郑玄云：“肖，似也。不似，言不如父也。”皇甫谧云：“尧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也。”

④【索隐】父子继立，常道也。求贤而禅，权道也。权者，反常而合道。【正义】五帝官天下，老则禅贤，故权试舜也。

⑤【集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

南河之南”处也。

⑥【集解】刘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旷年，于是遂反，格于文祖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

虞舜者，^①名曰重华。^②重华父曰瞽叟，^③瞽叟父曰桥生，^④桥生父曰句望，^⑤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颡顼，颡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

①【集解】溢法曰：“仁圣盛明曰舜。”【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溢也。皇甫谧云“舜字都君”也。

【正义】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陕州河北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郦元注水经云于桥东北有虞城，尧以女嫫于虞之地也。又宋州虞城大襄国所封之邑，杜预云舜后诸侯也。又越州余姚县，顾野王云舜后支庶所封之地。舜姚姓，故云余姚。县西七十里有汉上虞故县。会稽旧记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即舜所生也。周处风土记云舜东夷之人，生姚丘。”括地志又云：“姚墟在濮州雷泽县东十三里。孝经援神契云舜生于姚墟。”案：二所未详也。

②【集解】徐广曰：“皇甫谧云‘舜以尧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征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岁癸卯崩’。”

【正义】尚书云：“重华协于帝。”孔安国云：“华谓文德也，言其光文重合于尧。”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目重瞳子，故曰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

③【正义】先后反。孔安国云：“无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别好恶，故时人谓之瞽，配字曰‘叟’。叟，无目之称也。”

④【正义】桥又音娇。

⑤【正义】句，古侯反。望音亡。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①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①【索隐】皇甫谧云：“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也。”

舜，冀州之人也。^①舜耕历山，^②渔雷泽，^③陶河滨，^④作什器于寿丘，^⑤就时于负夏。^⑥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

①【正义】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括地志云：“妫州有

妫水，源出城中。耆旧传云即舜厘降二女于妫汭之所。外城中有舜井，城北有历山，山上有舜庙，未详。”案：妫州亦冀州城是也。

②【集解】郑玄曰：“在河东。”【正义】括地志云：“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亦名首阳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枣山，亦名猪山，亦名狗头山，亦名薄山，亦名吴山。此山西起雷首山，东至吴坂，凡十一名，随州县分之。历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余姚县有历山舜井，濮州雷泽县有历山舜井，二所又有姚墟，云生舜处也。及妫州历山舜井，皆云舜所耕处，未详也。”

③【集解】郑玄曰：“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正义】括地志云：“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处西北。山海经云雷泽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也。”

④【集解】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案：于曹州滨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东县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南去历山不远。或耕或陶，所在则可，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

⑤【集解】皇甫谧曰：“在鲁东门之北。”【索隐】什器，什，

数也。盖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为数，犹今云“什物”也。寿丘，地名，黄帝生处。【正义】寿音受。颜师古云：“军法，伍人为伍，二伍为什，则共器物，故谓生生之具为什器，亦犹从军及作役者十人为火，共畜调度也。”

⑥【集解】郑玄曰：“负夏，卫地。”【索隐】就时犹逐时，若言乘时射利也。尚书大传曰“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孟子曰“迁于负夏”是也。

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①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舜居妫汭，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②甚有妇道。尧九男皆益笃。^③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④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⑤一年而所居成聚，^⑥二年成邑，三年成都。^⑦尧乃赐舜絺衣，^⑧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使舜上涂廩，瞽叟从下纵火焚廩。舜乃以两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⑨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⑩旁出。^⑪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⑫舜从匿空出，去。^⑬瞽叟、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

分，^④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象取之。牛羊仓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⑤鼓其琴。舜往见之。象鄂不怍，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⑥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①【正义】可用，谓可为天子也。

②【正义】二女不敢以帝女骄慢舜之亲戚。亲戚，谓父瞽叟、后母弟象、妹颖手等也。颖音若果反。

③【正义】笃，悖也。非唯二女恭勤妇道，九男事舜皆益悖厚谨敬也。

④【正义】韩非子“历山之农相侵略，舜往耕，期年，耕者让畔”也。

⑤【集解】史记音隐曰：“音游甫反。”驩谓窳，病也。【正义】苦，读如盥，音古。盥，粗也。窳音痰。

⑥【正义】聚，在喻反，谓村落也。

⑦【正义】周礼郊野法云“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也。

⑧【正义】缁，敕迟反，细葛布衣也。邹氏音竹几反。

⑨【索隐】言以笠自扞己身，有似鸟张翅而轻下，得不损伤。

皇甫谧云“两缁”，缁，笠类。列女传云“二女教舜鸟工上

廩”是也。【正义】通史云：“瞽叟使舜涤廩，舜告尧二女，女曰：‘时其焚汝，鹤汝衣裳，鸟工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⑩【索隐】音孔。列女传所谓“龙工入井”是也。

⑪【正义】言舜潜匿穿孔旁，从他井而出也。通史云：“舜穿井，又告二女。二女曰：‘去汝裳衣，龙工往。’入井，瞽叟与象下土实井，舜从他井出去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妫州怀戎县西外城中。其西又有一井，耆旧传云并舜井也，舜自中出。帝王纪云河东有舜井，未详也。”

⑫【索隐】亦作“填井”。

⑬【集解】刘熙曰：“舜以权谋自免，亦大圣有神人之助也。”

⑭【正义】扶问反。

⑮【正义】宫即室也。尔雅云“室谓之宫”。礼云“命士已上，父子异宫”也。

⑯【索隐】言汝犹当庶几于友悌之情义也。如孟子取尚书文，又云“惟兹臣庶，女其于予治”，盖欲令象共我理臣庶也。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①世得其利，谓之“八恺”。^②高辛氏有才子八人，^③世谓之“八元”。^④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⑤不

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⑥以揆百事，莫不时序。^⑦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⑧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⑨

①【集解】名见左传。

②【集解】贾逵曰：“恺，和也。”【索隐】左传史克对鲁宣公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仓舒、殯皜、棖戡、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

③【集解】名见左传。

④【集解】贾逵曰：“元，善也。”【索隐】左传：“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⑤【索隐】谓元、恺各有亲族，故称族也。济，成也，言后代成前代也。

⑥【集解】王肃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预曰：“后土地官。”【索隐】主土。禹为司空，司空主土，则禹在八恺之中。【正义】春秋正义云：“后，君也。天曰皇天，地曰后土。”

⑦【正义】言禹度九土之宜，无不以时得其次序也。

⑧【索隐】契为司徒，司徒敷五教，则契在八元之数。

⑨【正义】杜预云：“内诸夏，外夷狄也。”案：契作五常之教，诸夏太平，夷狄向化也。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①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②少皞氏^③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④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天下谓之桀杻。^⑤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尧未能去。缙云氏^⑥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⑦天下恶之，比之三凶。^⑧舜宾于四门，^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⑩以御魑魅，^⑪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①【集解】贾逵曰：“帝鸿，黄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谨兜也。”

②【正义】慝，恶也。一本云“天下之民，谓之浑沌”。浑沌即谨兜也。言掩义事，阴为贼害，而好凶恶，故谓之浑沌也。杜预云：“浑沌，不开通之貌。”神异经云：“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黑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性，有腹无五藏，有肠直而不旋，食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名浑沌。”又庄子云：“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忽乃相遇于

混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欲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案：言谨兜性似，故号之也。

③【集解】服虔曰：“金天氏帝号。”

④【集解】服虔曰：“谓共工氏也。其行穷而好奇。”【正义】谓共工。言毁败信行，恶其忠直，有恶言语，高粉饰之，故谓之穷奇。案：常行终必穷极，好谄谀奇异于人也。神异经云：“西北有兽，其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剿食人，知人言语，闻人斗辄食直者，闻人忠信辄食其鼻，闻人恶逆不善辄杀兽往饷之，名曰穷奇。”案：言共工性似，故号之也。

⑤【集解】贾逵曰：“梼杌，顽凶无畴匹之貌，谓鯀也。”

【正义】梼音道刀反。杌音五骨反。谓鯀也。凶顽不可教训，不从诏令，故谓之梼杌。案：言无畴匹，言自纵恣也。神异经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大，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很，一名难训。”案：言鯀性似，故号之也。

⑥【集解】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正义】今括州缙云县，盖其所封

也。字书云缙，赤缙也。

⑦【正义】谓三苗也。言贪饮食，冒货贿，故谓之饕餮。神异经云：“西南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性很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言三苗性似，故号之。

⑧【集解】杜预曰：“非帝子孙，故别之以比三凶也。”【正义】此以上四处皆左传文。或本有并文次相类四凶，故书之，恐本错脱耳。

⑨【正义】杜预云：“辟四门，达四聪，以宾礼众贤也。”

⑩【集解】贾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⑪【集解】服虔曰：“螭魅，人面兽身，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以为人害。”【正义】御音鱼吕反。螭音丑知反。魅音媚。案：御魑魅，恐更有邪谄之人，故流放四凶以御之也。故下云“无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舜得举用事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让丹朱，天下归舜。而禹、皋陶、^①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②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③于是舜乃至于文祖，

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④则蛮夷率服。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⑤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舜曰：“然，往矣。”^⑥舜曰：“弃，黎民始饥，^⑦汝后稷播时百谷。”^⑧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⑨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⑩舜曰：“皋陶，蛮夷猾夏，^⑪寇贼奸轨，^⑫汝作士，^⑬五刑有服。五服三就；^⑭五流有度，^⑮五度三居：^⑯维明能信。”^⑰舜曰：“谁能驯予工？”^⑱皆曰垂可。于是以垂为共工。^⑲舜曰：“谁能驯予上下^⑳草木鸟兽？”皆曰益可。于是以益为朕虞。^㉑益拜稽首，让于诸臣朱虎、熊罴。^㉒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㉓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礼？”^㉔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为秩宗，^㉕夙夜维敬，直哉维静絜。”^㉖伯夷让夔、龙。舜曰：“然。^㉗以夔为典乐，教稚子，^㉘直而温，^㉙宽而栗，^㉚刚而毋虐，简而毋傲；^㉛诗言意，歌长言，^㉜声依永，律和声，^㉝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㉞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

舞。”^⑤舜曰：“龙，朕畏忌谗说殄伪，振惊朕众，^⑥命汝为纳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⑦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⑧敬哉，惟时相天事。”^⑨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分北二苗。^⑩

①【正义】高姚二音。

②【索隐】彭祖即陆终氏之第三子，篋铿之后，后为大彭，亦称彭祖。【正义】皋陶字庭坚。英六二国是其后也。契音薛，殷之祖也。伯夷，齐太公之祖也。夔，巨龟反，乐官也。倕音垂，亦作“垂”，内言之官也。益，伯翳也，即秦、赵之祖。彭祖自尧时举用，历夏、殷封于大彭。

③【正义】分音符问反，又如字。分谓封疆爵土也。

④【正义】舜命十二牧论帝尧之德，又敦之于民，远离邪佞之人。言能如此，则夷狄亦服从也。

⑤【集解】马融曰：“奋，明；庸，功也。”

⑥【集解】郑玄曰：“然其举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听其所让也。”

⑦【集解】徐广曰：“今文尚书作‘祖饥’。祖，始也。”

【索隐】古文作“阻饥”。孔氏以为阻，难也。祖阻声相近。未知谁得。

- ⑧【集解】郑玄曰：“时，读曰蒔。”【正义】稷，农官也。
播时谓顺四时而种百谷。
- ⑨【集解】郑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肃
曰：“五品，五常也。”【正义】驯音训。
- ⑩【集解】马融曰：“五品之教。”
- ⑪【集解】郑玄曰：“猾夏，侵乱中国也。”
- ⑫【集解】郑玄曰：“由内为奸，起外为轨。”【正义】亦作
“宄”。
- ⑬【集解】马融曰：“狱官之长。”【正义】案：若大理
卿也。
- ⑭【集解】马融曰：“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三就，
谓大罪陈诸原野，次罪于市朝，同族适甸师氏。既服五
刑，当就三处。”【正义】孔安国云：“服，从也，言得
轻重之中正也。”案：墨，点凿其额，涅以墨。劓，截鼻
也。剕，刖足也。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也。
大辟，死刑也。
- ⑮【正义】度音徒洛反。尚书作“宅”。孔安国云“五刑之
流，各有所居”也。
- ⑯【正义】案：谓度其远近，为三等之居也。

- ⑰【集解】马融曰：“谓在八议，君不忍刑，宥之以远。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 ⑱【集解】马融曰：“谓主百工之官也。”
- ⑲【集解】马融曰：“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 ⑳【集解】马融曰：“上谓原，下谓隰。”
- ㉑【集解】马融曰：“虞，掌山泽之官名。”
- ㉒【索隐】即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正义】孔安国云：“朱虎，熊黑，二臣名。垂、益所让四人，皆在元凯之中也。”
- ㉓【正义】为益之佐也。
- ㉔【集解】马融曰：“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
郑玄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礼。”
- ㉕【集解】郑玄曰：“主次秩尊卑。”【正义】若太常也。
汉书百官表云“王莽改太常曰秩宗”，依古也。孔安国云：“秩，序；宗，尊也。主郊庙之官也。”
- ㉖【正义】静，清也。絜，明也。孔安国云：“职典礼，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
- ㉗【正义】孔安国云：“然其推贤，不许其让也。”

⑳【集解】郑玄曰：“国子也。”案：尚书作“胄子”，穉胄声相近。【正义】穉，胄雉反。孔安国云：“胄，长也。谓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诗蹈之舞之，教长国子中和祇庸孝友。”

㉑【集解】马融曰：“正直而色温和。”

㉒【集解】马融曰：“宽大而谨敬战栗也。”

㉓【正义】孔安国云：“刚失之虐，简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也。”

㉔【集解】马融曰：“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正义】孔安国云：“诗言志以导其心，歌咏其义以长其言也。”

㉕【集解】郑玄曰：“声之曲折又依长言，声中律乃为和也。”【正义】孔安国云：“声，五声，宫、商、角、徵、羽也。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也。当依声律和乐也。”

㉖【集解】郑玄曰：“祖考来格，群后德让，其一隅也。”

【正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也。孔安国云：“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也。”

㉗【集解】郑玄曰：“百兽，服不氏所养者也。率舞，言音和也。”【正义】於音鸟。孔安国云：“石，磬。音之清

者。拊亦击也。举清者和，则其余皆从矣。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则神人和可知也。”案：磬，一片黑石也。不音福尤反。周礼云“夏官有服不氏，掌服猛兽，下士一人，徒四人”。郑玄云“服不服之兽也”。

③⑥【集解】徐广曰：“一云‘齐说殄行，振惊众’。”驷案：郑玄曰“所谓色取仁而行违，是惊动我之众臣，使之疑惑”。【正义】伪音危睡反。言畏恶利口谗说之人，兼殄绝奸伪人党，恐其惊动我众，使龙遏绝之，出入其命惟信实也。此“伪”字太史公变尚书文也。尚书伪字作“行”，音下孟反。言已畏忌有利口谗说之人，殄绝无德行之官也。

③⑦【正义】孔安国云：“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

③⑧【集解】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无所复教。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与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郑玄曰：“皆格于文祖时所敕命也。”

③⑨【正义】相，视也。舜命二十二人各敬行其职。惟在顺时，视天所宜而行事也。

④【集解】郑玄曰：“所甯三苗为西裔诸侯者犹为恶，乃复分析流之。”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皋陶为大理，平，^①民各伏得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②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辟；^③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④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⑤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阯、北发，^⑥西戎、析枝、渠廋、氐、羌，^⑦北山戎、发、息慎，^⑧东长、鸟夷，^⑨四海之内^⑩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⑪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①【正义】皋陶作士，正平天下罪恶也。

②【正义】工师，若今大匠卿也。

③【正义】婢亦反，开也。

④【正义】禹九州之民无敢辟违舜十二牧也。

⑤【正义】披音皮义反。谓傍其山边以通。

⑥【索隐】一句。

⑦【索隐】一句。

⑧【集解】郑玄曰：“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

⑨【索隐】此言帝舜之德皆抚及四方夷人，故先以“抚”字总之。北发当云“北户”，南方有地名北户。又案汉书，北发是北方国名，今以北发为南方之国，误也。此文省略，四夷之名错乱。“西戎”上少一“西”字，“山戎”下少一“北”字，“长”字下少一“夷”字。长夷也，鸟夷也，其意宜然。今案：大戴礼亦云“长夷”，则长是夷号。又云“鲜支、渠搜”，则鲜支当此析枝也。鲜析音相近。邹氏、刘氏云：“息并音肃”，非也。且夷狄之名，古书不必皆同，今读如字也。【正义】注“鸟”或作“岛”。括地志云：“百济国西南海中有大岛十五所，皆置邑，有人居，属百济。又倭国西南大海中岛居凡百餘小国，在京南万三千五百里。”案：武后改倭国为日本国。

⑩【正义】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⑪【索隐】招音韶，即舜东箫韶。九成，故曰九招。

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①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②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谨，③如子道。

封弟象为诸侯。^④舜子商均亦不肖，^⑤舜乃豫荐禹于天。^⑥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⑦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⑧以奉先祀。服其服，礼乐如之。以客见天子，^⑨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①【集解】皇甫谧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阳，或言潘。潘，今上谷也。”【正义】括地志云：“平阳，今晋州城是也。潘，今妨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东县界蒲阪故城是也。”

②【集解】皇览曰：“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曰九疑。传曰‘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山海经曰‘苍梧山，帝舜葬于阳，丹朱葬于阴’。”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③【集解】徐广曰：“和敬貌。”

④【集解】孟子曰：“封之有庠。”音鼻。【正义】帝王纪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营道县北六十里。故老传云，舜葬九疑，象来至此，后人立祠，名为鼻亭神。舆地志云零陵郡应阳县东有山，山有象庙。王隐晋书云本泉陵县，北部东五里有鼻墟，象所封地。”

⑤【集解】皇甫谧曰：“娥皇无子，女英生商均。”【正义】

樵周云：“以虞封舜子，今宋州虞城县。”括地志云：“虞国，舜后所封邑也。或云封舜子均于商，故号商均也。”

⑥【索隐】谓告天使之摄位也。

⑦【正义】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非时久居也。”

⑧【集解】樵周曰：“以唐封尧之子，以虞封舜之子。”【索隐】汉书律历志云封尧子朱于丹渊为诸侯。商均封虞，在梁国，今虞城县也。【正义】括地志云：“定州唐县，尧后所封。宋州虞城县，舜后所封也。”

⑨【正义】为天子之宾客也。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①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誉为高辛，帝尧为陶唐，^②帝舜为有虞。^③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姁氏。契为商，姓子氏。^④弃为周，姓姬氏。^⑤

①【集解】徐广曰：“外传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为氏姓’。又虞说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为十一姓，酉、祁、己、滕、

葳、任、荀、釐、媯、偃、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正义】釐音力其反。媯音其吉反。偃音在宣反。

②【集解】韦昭曰：“陶唐皆国名，犹汤称殷商矣。”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中山，唐县是也。”

③【集解】皇甫谧曰：“舜嫫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

④【索隐】礼纬曰：“禹母脩己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姁氏。”而契姓子氏者，亦以其母吞乙子而生。

⑤【集解】郑玄驳许慎五经异义曰：“春秋左传‘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者，氏之别名也。姓者，所以统系百世，使不别也。氏者，所以别子孙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则在上，言氏则在下也。”

太史公曰：^①学者多称五帝，尚矣。^②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③荐绅先生难言之。^④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⑤儒者或不传。^⑥余尝西至

空桐，^⑦北过涿鹿，^⑧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⑨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⑩顾弟弗深考，^⑪其所表见皆不虚。^⑫书缺有间矣，^⑬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⑭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⑮

①【正义】太史公，司马迁自谓也。自叙传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云“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祸”。明太史公，司马迁自号也。迁为太史公官，题赞首也。虞喜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独迁。”

②【索隐】尚，上也，言久远也。然“尚矣”文出大戴礼。

③【正义】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

④【集解】徐广曰：“荐绅即缙绅也，古字假借。”

⑤【正义】系音奚计反。

⑥【索隐】五帝德、帝系姓皆大戴礼及孔子家语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经，故汉时儒者以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传学也。

⑦【正义】余，太史公自称也。尝，曾也。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百里，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处。

⑧【正义】涿鹿山在妫州东南五十里，山侧有涿鹿城，即黄帝、尧、舜之都也。

⑨【索隐】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

⑩【索隐】太史公言己以春秋、国语古书博加考验，益以发明五帝德等说甚章著也。

⑪【集解】徐广曰：“弟，但也。史记、汉书见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赋曰‘弟如滇池’，而不详者多以为字误。学者安可不博观乎？”【正义】顾，念也。弟，且也。太史公言博考古文，择其言表见之不虚，甚章著矣，思念亦且不须更深考论。

⑫【索隐】言帝德、帝系所有表见者皆不为虚妄也。

⑬【正义】言古文尚书缺失其间多矣，而无说黄帝之语。

⑭【索隐】言古典残缺有年载，故曰“有间”。然帝皇遗事散轶，乃时时旁见于他记说，即帝德、帝系等说也。故己今采案而备论黄帝已来事耳。

⑮【正义】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故著为五帝本纪，在史记百三十篇书之首。

【索隐述赞】帝出少典，居于轩丘。既代炎历，遂禽蚩尤。高阳嗣位，静深有谋。小大远近，莫不怀柔。爰洎帝誉，列

圣同休。帝攀之弟，其号放勳。就之如日，望之如云。
郁夷东作，昧谷西曛。明敷仄陋，玄德升闻。能让天下，贤
哉二君！

附录

走出疑古时代*

一 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

* 本文为李学勤先生在1992年一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后经李零先生等整理成文，刊于当年《中国文化》第七期。

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 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当然是物质的，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其实道理很简单，比如一个墓葬，它总

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一个铜器、一个陶器，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于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 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最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

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最近我很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1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印证古书。而印证古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最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沔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

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间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

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最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19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哪儿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瀚容主编。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最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的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

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皙、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

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最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最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第一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第一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

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的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那么现在问题是我们发现这么多东西，现在看起来绝大多数是佚书，即使是今天还有传本的，也很不一样。比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怎么会把《德经》放到《道经》前面？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台湾一些学者的意见也不是没有

一点道理，就是抄写时把上下篇给拿错了。当时是抄写上的错误，造成了一种暂时流行的本子。这我自己是不接受，但还是可以考虑。

三 学术史的再认识

以上所说，引起种种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它对我们学术史研究的影响还不仅仅是这些发现的东西本身。我们看见《周易》经传这些东西，当然对研究《周易》有很大好处。我们看到《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看到《孙子》，对研究孙子很有用。但我以为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出土的东西所显示的当时的学术面貌。这种面貌和我们过去的估计相当不一样，这件事是个大问题。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有一个改观的必要。

当然如何评价这个影响，今天我们还做不到。虽然我比在座的几位痴长几岁，但就连各位也不可能完全看到其结果。因为发现太多了，不断出现，必须深入研究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其成果。可是有一点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

的，就是学术史恐怕得重写，还不仅是先秦和秦汉学术史的问题，而是整个学术史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特别重要。今天已经可以认识到，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

我说的思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深受影响的疑古思潮，下面我说说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你们大概都看过我在《人文杂志》增刊上的一篇文章。这里我得做点儿说明，从小我就读过《古史辨》。小时候我有一次走到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古史辨》第三册的上本，看过之后就着迷了，后来把整个《古史辨》都买来看。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从思想来说是冲决网罗，有很大进步意义，是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都踢翻了，经书也没有权威性了，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当然很好。可是它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

从晚清而起的这股思潮不只是中国有，外国也存在，如日本的白鸟库吉，他不是写过《尧舜禹抹杀论》吗？在日本也成了名文。奇怪的是这篇东西在中国怎么没见过？我觉得

现在应该翻译翻译了。西方如马伯乐，他写的东西也是这个作风，而且也是比较早的。晚清以来的看法为什么在中国会造成这种影响，还可以向上追溯到清代的学术史。

我一直认为清儒的学术是做出了巨大成绩的，可是，它有一个极不好的地方，在今天还有影响，就是它很讲门户。当然这一点，实际上晚明也有，晚明就有人开始讲门户，可是明末清初的一些大学者还是很博大。所谓“三大家”，甚至于像“四公子”这些人，不管他学什么，都是很博大。甚至一些较小的思想家，像江西的易堂九子，都很博大，还没有门户之见。但清朝自己的学术确立之后，特别讲门户，一点点讲，第一步是分汉、宋，首先就把宋学一脚给踢出去了。最初宋学的影响还是很大，像李光地这些人还是大受重视。可是后来汉学逐渐上升，汉、宋的门户就先分开来了。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就是证据。分了汉、宋之后，再分西汉、东汉，把今、古文分开了。然后在今、古文里还要分，越分越小，眼界越来越狭窄，看的书越来越少。这个分门户的办法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辨伪。这个讲门户实在要不得。我觉得我们写学术史，一定不要这样。

有一点要指出的，就是在对古书的辨伪上，晚清的疑古思潮反而是继承宋学。宋人是开始辨伪的，在这一点上，它是完全继承了。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直接读古书，不依靠汉唐注疏，这当然是好事。我常常说，他们对早期儒家的一些认识，在某些点上可能比汉代人认识的还正确些，因为他们直接读古书，不考虑后来的师说，可能有些地方是值得考虑的。不过这种倾向发展到末流，就变成了师心自用，特别是明朝一些人，简直是束书不观了。清人改变了这种风气，但门户之见在带来的副作用中是很重要的一点。

四 古书新证（甲骨金文）

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是真伪与年代。在这方面，有两本书可以作为标志，一本就是1950年代张心澂的那部《伪书通考》，各个图书馆都有这本书。（李零：国外汉学家也是必读此书。他们要用哪本书，总要先翻翻此书！）张心澂的书前面有一部分是

讲方法论，举了多少条，代表他的辨伪方法。其影响之大，你别看余嘉锡先生那本书，也比不了。余先生的书，即《古书通例》，是上海出的。其实《古书通例》比张心澂写得好得多。第二部书就是郑良树的《续伪书通考》，不知大家看过没有？他也有讲方法论的部分，对比一下就知道时代已经变了。做《续伪书通考》的这位郑良树先生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原来作过马来亚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是台大的早期毕业生。你看《续伪书通考》就可以知道，近二三十年来，关于辨伪方面的认识已有很大的变化，这是很明显的。这里起很大作用的就是考古发现。这可以说明现在的学术界对疑古思潮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扬弃。这点是对的，特别是我们从新发现来看，有些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我想就古文字对文献的关系举几个例子。

我们先说说简帛书以外的。简牍帛书以外的东西对于古书也可以印证，如甲骨文。有一点我要说明，甲骨文所能表现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认为甲骨文没有的东西商朝就不能有。这点是很重要的，例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甲骨卜辞的文体并非当时的唯一文体，这种说法很有意义，因为各个时代都有一些不同文体，今天仍然如此。比如报刊

上的社论，外交用的文件，和日常写的书信绝对不能比拟。甲骨文只能刻那么很少的一点儿字，它的文体一定是力求简练，不能用很多虚词。至于当时的一篇文章，就一定不同，如《商书》的一些篇和《商颂》，与商代有关系还是完全可能的。董作宾先生写过一篇论文叫《王若曰考》，文中引述了一版甲骨文，上刻有“王若曰：羌女……”等语。下面的“羌女”当然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最好的解释还是“羌，汝……”，这是对羌人的一种文告，意思是王这样说：羌，你如何如何。可见当时就有“诰”这样一种文体。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商书》里的“王若曰”，还有“微子若曰”，并不是周人所拟作。

还有一个例子，现在很多人都说甲骨文里没有四季，我从来不这么看。当然甲骨文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夏”、“冬”这两个字，可是这一点不等于说当时没有四季的观念。我们从常识来讲，也是这样。我这个人劳动下放去过好几回，农业还多少干过一点。我们知道，只要在华北这个地方住，是不可能没有四季观念的，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在甲骨文里有四方、四风，就是有四季，因为四方风的观念就是和四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那些表示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的名称，如“析”呀、“因”呀，就是这么来的，怎么能没有四季呢？其实过去于省吾先生在《甲骨文字释林》中已经接触到了。记四方风名的甲骨已经可以明确地证明四季的存在了。最近，我还想写一篇文章，《山海经》讲四方风的地方，大家不太注意，就是它里面总是讲到“司日月之长短”。“司日月之长短”说明那个风和风来的方向是与四季有关。所以甲骨文里的很多东西也可以论证文献。胡厚宣先生是首先揭示四方风名的意义的，其贡献实在很大。

金文也是这样。金文也有局限，因为金文是铸在铜器上，它不可能把很多东西都记录下来，我们也不能说金文没有的东西当时就没有。金文与文献印证的地方很多，比如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到《逸周书》的《祭公》，其中有些句子和金文完全一样，而且有些错字也能看出来了，如金文中常见的“盥（音 li）𩚑”，《祭公》这篇文章里把它写成了“执和”。这样我们就知道《祭公》一定是西周的作品。

还有一些铭文也是如此。前些时候我写了一篇小文章，是讲陕西出土的一件史惠鼎。那鼎不算什么，但它写着

“日就月将”，这是出自《诗经》的《敬之》篇。《敬之》篇传说是周成王时作的，鼎作于西周晚期，自然可以引用。还有中山王的铜器里引了后来收入《大戴礼记》的一段话，这段话可能出自乐武子，是春秋时期的。我们从中山王铭文还可以看出，当时中山国的人不仅学《诗》，还可能学了《左传》，都是儒家的作品。这些是甲骨金文，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简牍帛书。

五 古书新证（简牍帛书）

关于简牍帛书，我这些年有一些想法，可能对学术史的研究有一些作用。我认为最理想的是，用今天出土的这些材料设立几个定点，然后把其他的古书排进去。过去研究古书和古书的关系，比如哪个比哪个早，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推定，可是年代每每没有绝对的定点。比如假设有 A、B、C 三种书，A 早于 B，B 早于 C。按相对年代来说，你可以把它们放得早些，也可以放得晚些。你只要把 A、B、C 这三个点的顺序排对了，形成一个系列，就完了，很难

知道它的绝对时间在哪儿。可是今天我们的考古学材料却可以提供中间的一些定点。只要把一个点定住了，A、B、C序列的时间就容易排定。当然这还需要很多的证据，现在也许还做不好，但至少可以先定几个点试试。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我到处做检讨的一个例子，是我关于信阳长台关楚简的说法。1956年的时候，信阳长台关1号大墓发掘出了两批竹简。竹简发表后，那个时候我年少气盛，喜欢抢时间，马上就写了篇短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我说竹简中的一篇是儒家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先王”、“三代”和“周公”这些词，儒家气极浓。大家都承认我这个说法。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就把它忘了，很长时间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到了“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几位学者从中找出了几句话，在古书中有，是《墨子》的一条逸文，见于《太平御览》。过了些年，我再看这组竹简，特别是信阳长台关的报告出来，有了更好的释文，才发现不是原来我想的那么回事。既然是《墨子》佚文，这怎么还是儒家作品呢？后来查了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墨子》里面也有“三代”、“先王”、“周公”这些东西，一点不少。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收入徐中舒先

生的纪念论文集，说明这组简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后来我看到李家浩写的一篇文章，他把“周公曰”后面的字读为“易”，说这就是“申徒狄”的“狄”字，这就完全证明了那段话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恐怕应该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候的人。这个《墨子》佚篇的确定是很重要的。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佚篇类似于《墨子》书中一般认为特别晚的那些篇，如《贵义》、《公孟》等。这些篇大都认为比较晚，肯定要比《墨子》前面学者认为是墨子自著的那些篇，如《明鬼》、《节葬》，要晚得多。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了。墨子本人是到过楚国的，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的作品，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其实一点儿也不晚，顶多是墨子下一代人写的。我想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的意义很大。还有《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跟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了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是称“王”，有的地方还是称“公”，可见后者当时秦还没

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多。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出楚帛书的那个墓葬的年代是确定的。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清理了那个墓葬，清理时又发现了一幅帛画。从陶器排队等方面看，它的年代一定是在战国中晚期之间，就是公元前300年左右。所以楚帛书的内涵在公元前300年一定有了，不可能比这个时候更晚。这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定点。楚帛书是一种阴阳数术性质的书，在学术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楚帛书的内涵中有许多思想、文化的因素，既然楚帛书的年代定了，这些因素也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300年。从这里出发，便能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推论，有益于学术史的探讨研究。

反过来，也可以用文献的定点来推定出土材料的时代。最好的例子是《鹖冠子》。《鹖冠子》现在在海内外都是热门，最近我去美国，也谈了《鹖冠子》，见到一些研究这部古书的学者。《鹖冠子》的年代比较清楚，它的上、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因为很明显的是，庞煖死的年代是

已知的，书中称呼他作“庞子”，是庞煖学生的口吻，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可见一定也经过秦代。仔细考虑，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大家了解，要是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鹖冠子》就还是冤沉海底。《鹖冠子》从唐代柳宗元那儿就给否了，后来的人对柳宗元崇拜得很，所以很少有人肯定《鹖冠子》，以致到今天连个好的注本都没有。从版本说，《鹖冠子》就有两个明版，一个是明翻宋本，即《四部丛刊》影印的那个本子，还有一个就是《道藏》本。两个本子差别不大。至于注，最早是北宋陆佃注。所谓唐写本《鹖冠子》是假的，前不久，陈鼓应先生找我写篇小文，我就讲了《鹖冠子》的年代问题。那篇稿子写得比较粗糙，比较仓促，希望大家多给予批评。我举了几个例子，可以证明是《鹖冠子》引用在马王堆帛书中发现的《黄帝书》，《黄帝书》是早于《鹖冠子》的。特别是像“五正”这样的词也见于子弹库楚帛书，更能说明它的年代。

不管怎么说吧，我们的想法是现在出土的很多东西可以和传世的古籍相联系。像《鹖冠子》，虽然没有出土，但它和帛书《黄帝书》很像，可以说明《鹖冠子》确实是

楚人作的，而且也比较早。像这些例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定点，可以作出很多的推论，而这些推出的结果，它的趋向是很明显的，就是和疑古思潮相反。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使学术史变得丰富多了。因为过去很多书不能提。我就记不起有哪本哲学史的书提到过《鹖冠子》。这本过去所有人都不提的书，现在看来大有可谈，那里面包含着很多哲学概念，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刮目相看。

上面我说学术史一定要重新写，其实不只是先秦的、汉代的，后来的也要重新写。关于后者，在这里我也要讲几句。我们每一代人，在学术上、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发展。在文献学方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扬弃清人的门户之见，因为清人的缺点就在这里。如果你不排除他们的门户之见，一定做不出什么新的成果。有一点我印象最深。我最早看到帛书《周易》，首先注意的就是它的次序，就是所谓卦序。它和今本到底哪个更早呢？我自己认为，帛书《周易》是很晚的，因为它完全是按阴阳说排列，做法很像京氏易，只不过比较简单，没有京氏易

那一套系统。它实际上是分宫的，即以下卦分宫，这比后来如《元包》之类好多了，我们参加整理的人都发现，按照帛书的卦序，也可以画出一种卦位图，这种图和宋人所说的先天卦非常类似，只有四隅卦差了九十度。为什么？那道理就是因为《说卦》中“天地定位”那几句话，帛书本与今本略有不同。如果是按照今本的样子，那就画出先天卦位来了。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尚秉和及近代那些搞汉易的人，如日本的铃木由次郎的《汉易研究》，他们指出在汉代已经有先天卦的观念，我觉得这是正确的。所以后人所谓“河图洛书”，宋代讲易学的那些基本的东西，不可能是宋人发明的。清朝人搞门户，特点就是好给人戴帽子。当时最大的帽子就是“二氏”，他们考出宋人的卦图出于陈抟，这个帽子就套上了。陈抟不是老道吗？陈抟既然是老道，你当然就是背弃了儒家正宗。但是道教难道就不可以保存汉代的一些东西，甚至是先秦的东西吗？例如今天我们看见的《周易参同契》，里面保存的东西就是比较早的。汉易本以象数为本，后来王弼一扫象数，就把这些东西忘掉了。儒家的人忘了，但道教把它保存了，反而得到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我们不讲门户，这个问

题本来是很平实的。

另外马王堆帛书《五行》，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来。宋学的一些基本观念，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先秦不会有，但现在在帛书里面都有。比如“理”呀、“性”呀，帛书里都讲到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宋学本来是以思孟之学为本，而《五行》正是思孟一派的作品。从现在发现的新材料出发，再去看传世各种文献，宋人所说曾参、子思、孟子的统系确是存在的。《五行》的作者，应该是这一派的后学。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宋学有些地方是比较接近先秦的。

六 结语：走出“疑古”时代

前面谈到宋学，也就是清人所划分的汉、宋的问题。其实，今、古的问题也是这样的。汉代当然有所谓今文经、古文经，问题是当时是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说，今文为一派，古文为一派，两派水火不相容呢？这是一个很值得重新审查的问题。我前些时候写的一篇小文，实际上是一条札记，印在张岱年先生主编的《国学丛书》第一种《国学今论》

里，题目叫作《〈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今古学考》是清末今文经学大家廖平先生的名著，对康有为的经学有很大影响。平分今古是廖氏经学初变的宗旨，《今古学考》主要是依据东汉许慎的《五经异义》，把汉学严格分为今文、古文两派。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了经学史的常识。可是仔细覆按《五经异义》，发现很多地方与《今古学考》不合。许慎本人据《说文·叙》所说，“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里所说的《易》孟氏是孟喜之学，明明是今文，不是古文，可见许慎并不是专学古文的。他的《五经异义》，也是有时尊今文，有时尊古文，并没有门户之见。《今古学考》强把“孟氏”改成“费氏”，是没有理由的。这一类例子说明，在学术史上有许多带关键性的问题，今天是必须重新考虑了。

冯友兰先生曾讲到一个“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后来有学者认为，不如把“释古”改成“考古”。考古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前面已经谈了不少，我近来写的一篇纪念郭沫若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也特别强调他倡导以考古探索古史的功绩。不过，当前大家说

“考古”，基本上是指田野考古，其涵义恐怕不像“释古”那么宽广。我想说的是，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我们要讲理论，也要讲方法。我们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疑古”时代所不能做到的。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谈“信古、疑古、释古”*

前年我应邀在一次小型学术座谈会上作了发言，后经友人整理，发表在《中国文化》第七期上，标题为《走出疑古时代》。最近辽宁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的小书，书名便移用了这个题目。对于有关问题，我本已没有新的话可说，只是发言中引到冯友兰先生的一个提法，未能详细说明，有些遗憾。正好《原道》创刊，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些东西，于是想略谈几点，作为那次发言的补充。

我所引冯友兰先生的话，见于30年代后期他为《古史辨》第六册撰的序，近年已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冯先生说：

我曾说过，中国现在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就中信古一派，与其说是一种趋势，

* 本文原刊《原道》1994年第一辑。

毋宁说是一种抱残守缺的人的残余势力，大概不久就要消灭；即不消灭，对于中国将来的史学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真正的史学家，对于史料，没有不加以审查而即直信其票面价值。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审查史料。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作，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就整个的史学说，一个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家的工作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一个人只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须如此。由此观点看，无论疑古释古，都是中国史学所需要的，这期间无所谓孰轻孰重。

冯先生的这段话，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作为补白的“语林”摘录了^①，已经引起更多人的

^①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1期，第48页。

注意。

好多年来，学者们谈起冯先生的“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总是当作三个阶段来理解的，甚至认为三者的关系是辩证法的正、反、合。重看上面引的原话，冯先生只讲了三种趋势，没有说三个阶段。他提到的“阶段”，是说审查史料和融会贯通为历史研究工作的两阶段，不是以“信古、疑古、释古”为三阶段。不过，细心吟味冯先生所讲，信古一派将归消灭，显然已属过去；疑古、释古均为历史研究所必需，但融会贯通究竟应居审查史料之后。因此，冯先生所说的三种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带有三个阶段的意味，不少人将之理解作三阶段说，不能认为出于无因。

“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涉及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信古”一名之生，是由于疑古思潮的兴起，在疑古出现以前并无其说；而“释古”一名的提出，又是为了与疑古有所区别。所以，“信古、疑古、释古”一说的出现，关键仍在疑古思潮的盛行。疑古思潮最盛的时期，正是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冯友兰先生“信古、疑古、释古”之说，是针对当时业已充分展开的这一思潮及其影响

提出来的。

疑古有着相当久远的根源，疑古思潮中的不少著作，已经把这一点反复说明了。需要指出的是，历史上有好几次流行疑古的风气，各有代表的学者和作品，就其成果的承袭来说，确有一贯的脉络。但是，各个时期的疑古之风，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互不相同，绝不可一概而论。

疑古之风的首次流行，是在宋代。北宋庆历以后，学风丕变，如王应麟《困学纪闻》所云：“自汉儒至庆历间，谈经者守故训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宋儒之学的一般特点，是以义理之学取代汉唐的注疏之学^①，从而能摆脱注疏的约束，直接考察作为经典的古书，自行裁断。集宋学大成的朱子，便是富于这种精神的，其流风遗韵直至明代。

疑古之风的第二次流行，是在清初。清儒力反宋学，而于辨伪书方面则继续了宋人的统绪。他们所辨古书，每每同反对宋学有关。例如阎若璩等指摘古文《尚书》，

^①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97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宋儒津津乐道的《大禹谟》十六字心传便失了依据；胡渭等批评河图洛书，也是针对周敦颐以至朱子的学说。清人崇尚门户，先以汉学反对宋学，接着以今文经学反对古文经学。刘逢禄作《左氏春秋疏证》等例子，是大家熟知的。

到了晚清，今文经学与变法维新的进步思想结合起来，这一趋向，在龚自珍学说中已见其端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① 这一学派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著《礼经通论》等等，都主张辨伪，梁氏书中已有详述。至于其最典型的人物著作，自推康有为及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梁书指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受廖平影响，“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著书，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乃尽弃其旧说”。^① 我们却不能说廖氏也有像康有为那样的变法维新立场。由此可见，不可以把当时的今文学派同变法维新完全等同起来。

康有为的著作对 1920 年代以来的疑古思潮有颇大影响，可是两者的思想性质实有根本的不同。康氏和其他今文经学家一样，把孔子推崇到神的地位，后来力倡建立孔教，1920 年代的疑古思潮则与此相反。顾颉刚先生 1924 年在一则笔记中说：“我们今日所以能彻底地辩论古史，完全是没有崇拜圣人观念之故。这崇拜圣人的观念须到今日伦理观念改变时才可打消。”^② 这与康有为的孔教刚好对立，有很不同的历史背景。无论如何，龚自珍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 1920 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都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我曾说“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③，即指此而言。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61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

②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 10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③ 李学勤：《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1982 年。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确实把信古打倒了。凡细读过七册《古史辨》的人，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清以来这方面的成果，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如顾颉刚先生在1922年建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

《古史辨》肇端于1923年在《读书杂志》上进行的长达九个月的古史讨论，随之一个阶段的论争主要是环绕古史问题，后来讨论的范围渐趋扩大，涉及古代的很多方面，特别是古书的真伪问题更是突出。现在看来，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最显著的，正是在古书的辨伪问题上。冯友兰先生专门提出的史料审查，也即这个问题。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费了。中国旧学，十有九是书本上学问，而中国伪书又极多，所以辨伪书为整理旧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① 自宋以来，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61、383页。

学者疑古，首在辨古书之伪，其成效昭著，为人所共见。但是他们的辨伪，每每议论纷纭，难于折衷，并且扩大化，以至如梁氏所说伪书极多，汉以前古书几乎无不可疑，所谓“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于是产生。

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限制在这样的圈子里，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我不很清楚冯友兰先生所讲融会贯通的释古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在二三十年代，重建古史的正面工作实际已在开始了。我们看中国古史研究之所以有今天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有了新的理论观点和考古发现，而这两者都可溯源到 1920 年代。

这里当然要提到王国维先生。

王国维先生早年治哲学、文学，1911 年冬东渡日本后始转攻经史小学。他研究经学，既不是康有为那样的今文家，也不是章太炎那样的古文家。实际上，他对于清代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并非漠视，而是做了很多切实重要的研究工作。例如他在 1916 年开始研究汉魏石经，尤其注意魏石经的古文，这一工作随着石经陆续出土而逐步深入，一直

到1925年还在继续^①。也是在1916年，王国维先生在研究石经中，“颇怪汉石经诸经全用今文，而魏时全用古文，因思官学今古文之代谢实以三国为枢纽，乃考自汉以来诸经立学之沿革，为《汉魏博士考》”，书共三卷^②。他从古文字学角度，专门研究古文，1916年著《汉代古文考》^③，1918年校唐写本《尚书孔传》和薛季宣《书古文训》^④，到1926年还作有名文《桐乡徐氏印谱序》^⑤。此外，1917年和1920年，王氏又校勘过与古文经学有关的《孔子家语》。至于他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是用不着在这里多说的。

1927年3月，王国维先生的学生姚名达给顾颉刚先生写信，讲到：“‘王静安（国维）先生批评先生，谓疑古史的精神很可佩服’，然‘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⑥这体现了王氏对疑古一派的态度。王氏是努力于

①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57、120、122、124、133、138、150等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

② 同上书，第62页。

③ 同上书，第63页。

④ 同上书，第78页。

⑤ 同上书，第162页。

⑥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39页。

古史的建立的，他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建立古史的方法。

大家知道，1924年冬，顾颉刚写信给胡适，荐王国维到正在筹办的清华学校研究院，胡适遂向清华推荐^①。次年初，王氏就聘，4月迁入清华。7月，应学生会邀请，向暑期留校学生讲演，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代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发表于《清华周刊》^②。文中列举近期古器物图籍的发现，强调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9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学，王氏讲课题为《古史新证》，其总论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

①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36页；又顾潮：《顾颉刚年谱》，第101页。两书所记月份稍有不合，似应以顾书为准。

②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3—144页。此文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今始得为之。^①

对他7月讲演的观点，作了理论的提高和引申。王氏的研究与疑古的差别，在上述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要提到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史的先声。他在自序中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②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序里特别讲到“在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然而他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

^① 孙敦恒：《王国维年谱新编》，第146页。此文后收入《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五，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②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追论及补遗”中，郭沫若先生肯定“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①，并就顾氏提出的夏禹的问题，依据“准实物的材料”（齐侯罇及钟、秦公簋等），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仍然是以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为出发点的。

把古书的记载与考古的成果结合起来，再上升到理论的高度，郭沫若先生开拓的这条道路，决定了此后很多年中国古史研究的走向。应该说这已经超出疑古，而进入新的时代了。

冯友兰先生肯定疑古一派的史料审查，是很正确的。有些朋友（包括外国学者）担心我们不重视史料审查了，也不无道理。现在确有些论作忽略了史料审查，他们的结论自然是不可信的。在史料审查上，我们主张要以“二重证据法”来补充纠正疑古一派的不足之处。疑古的史料审查，由于限于纸上的材料，客观的标准的不足，而“二重证据法”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证明纸上之材料，这本身便是对古书记载

^①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第30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的深入审查。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对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作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①

这就是我大胆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原因。

^①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后 记

这篇《史记·五帝本纪》的讲课记录稿，幸蒙三联书店不弃，即将惠予出版，我是非常感谢的。编辑先生要我在书末写几句话，向读者推荐一些可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籍，这件事我未必能做好，有挂漏失当之处，还要请大家鉴谅。

在讲课中，我强调了中国古史的“五帝”一段乃是中国文明起源并初步发展的时代，因此，对“五帝”时期历史的追溯，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是整个人类文明形成演进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正由于如此，在现代学术史上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对之试行探索，出现了不少有不同方面贡献的论作，要想逐一介绍给读者，是相当困难的。好在近年我们已经有了—本便于检索的工具书，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著的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文物出版社，2003年）。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一书，如该书卷首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所说：“既是一部专题研究工具书，又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反映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成果与观点的学术著作。该书全面收集、摘编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各种论著，……并将摘编的约八百篇论著分为三十个研究专题编排，集中展示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这三十个专题被划作五大部分：

- 一、综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 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专题研究；
- 三、中国几个主要区域的文明起源研究；
- 四、中国文明起源与古史研究；
- 五、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成果评介与回顾。

我建议读者先选择几种综论性质的代表著作，例如李济的《中国文明的开始》（商务印书馆，1970年；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又三联书店，1999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和张光直的《中国古代文明之起源

与发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几种书《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均已著录，在《要览》出版之后的新作，可读李伯谦的《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许顺湛有《黄河文明的曙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见于《要览》著录。其近年新作《五帝时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则标明“五帝”。与之类似的，还有郭大顺的《追寻五帝》（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

标出“五帝”，即涉及古史传说。专论古史传说的，建议读徐旭生（炳昶）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并可参看他与苏秉琦合作的论文《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书首天石所写的序说：“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号称五帝。徐老指出，这个时代，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是已由量变达到质变的时代。”所说“质变”，应即指跨入文明的门槛。

根据三联编辑先生的要求，我这篇讲课记录稿后附印

了我过去发表的《走出疑古时代》和《谈“信古、疑古、释古”》两文，我想这是因为在讲课时有听众提起有关问题的缘故。不过，编辑先生在电话中指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成文，迄今已有二十年，这确是我没有意识到的，使我为之一惊。

可能有的读者了解，《走出疑古时代》原来是1992年我在北京大学一次小规模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经李零等先生记录，刊登在刘梦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其间谈到的几点陋见，其实尚可回溯到1981年我在西安“先秦史座谈会”上讲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如果从那时算起，竟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走出疑古时代》和《谈“信古、疑古、释古”》所涉及的，是怎样看待和研究中国古史的问题，特别与“五帝”时期相关。读者如关注我在两文中讲到的“疑古”思潮，想对之有所探讨，当然最好是去读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容易得到的是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本子。若欲概观这一思潮的缘起，以及有关讨论的始末，可看吴少珉、赵金昭主编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还有张京华的《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

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徐葆耕《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7年)一书, 关于“信古、疑古、释古”有值得注意的申述, 大家也可以参读。

最后, 我还想特别说一下, 在《走出疑古时代》那篇小文里, 我曾记述张政烺先生几次讲起, 如果能发现《尚书》就好了。堪以告慰张先生的是, 在2008年秋天入藏于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中间, 终于出现了若干篇《尚书》, 包括传世本有的或没有的, 还有不少与《尚书》类似的文献。今年正值张政烺先生百年诞辰, 特志此以表纪念。

李学勤

2012年3月27日

中国文化论坛简介

中国文化论坛成立于 2004 年，其宗旨为：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历史处境，以跨学科的合作方式，从具体问题切入，重新认识中国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促进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明主体性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论坛于 2005 年 6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首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由韦钰任会议名誉主席，甘阳为执行主席。会议论文集《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6 年）。

第二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 2006 年 8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卧佛寺举行，会议主题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由杨振宁、杜维明任名誉主席，黄平为执行主席。会议论文集《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7 年）。

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 2007 年 8 月 1 日至 2 日在北京卧佛寺举行，会议主题为“孔子与当代中国”。会议名誉主席

为金耀基，执行主席为陈来。会议论文集《孔子与当代中国》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8年）。

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2008年7月5日至7日在广东汕头大学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执行主席为陈春声、朱苏力。会议论文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

第五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2009年7月29日至3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会议主题为“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执行主席为童世骏。会议论文集《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0年）。

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2010年8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执行主席为余永定。会议论文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1年）。

第七届中国文化论坛年度大会于2011年8月6日至7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理想政体：古今中外的探求”，执行主席为王绍光。会议论文集《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已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2年）。

在首届论坛“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的共识基础上，为推动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中国文化论坛于2007年7月26日至31日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了首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该届授课教师为彭林、甘阳、李学勤、汪晖、刘小枫。

第二届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于2008年6月29日至7月4日在汕头大学举行。该届授课教师为钱致榕、朱鸿林、朱苏力、刘小枫、王绍光。

第三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于2009年7月23日至28日在复旦大学举行。该届授课教师为潘公凯、朱维铮、张汝伦、赵辰、王铭铭。

第四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于2010年8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该届授课教师为李猛、张旭东、刘小枫、甘阳、强世功。

第五届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于2011年7月31日至8月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该届授课教师为陈来、张旭东、吴飞、吴增定、甘阳。

中国文化论坛理事会构成

顾 问

杜维明 金耀基 李泽厚 韦钰 王元化 许倬云 杨振宁

理事长

董秀玉

理 事

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

甘阳：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重庆大学古典研究中心主任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党委书记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

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文化论坛
China Culture Forum

经典通识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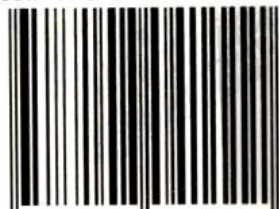
第一辑（四种）

- 甘 阳 《僭主奥狄浦斯》讲稿
刘小枫 普罗米修斯之罪
吴增定 《敌基督者》讲稿
王绍光 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

第二辑（六种）

- 李学勤 《史记·五帝本纪》讲稿
陈 来 竹简《五行》篇讲稿
朱鸿林 《明儒学案》选讲
朱苏力 《窦娥冤》与中国法律传统
汪 晖 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
王铭铭 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

ISBN 978-7-108-04111-1



定价：30.00 元

9 787108 041111 >